思想與時代月刊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思想與時代社
貴州遵義水關街三號

印刷者 貴陽中央日報社
六廣門外高家園

第十八期預告

張蔭麟先生紀念號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發行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冊數	一	六	十二
價目	[illegible]元	十八元	二十六元
郵費（定費外另加） 國內	一角五分	九角	一元八角
國外	照郵局規定辦理		

注意

一、定戶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原址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交本社方可辦理。

二、本刊郵票代價暫不接收。

三、信內附寄法幣，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四、本社歡迎直接訂閱，各大學學生有證明文件者訂閱八折優待。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請郵寄貴州遵義水關街三號本社收。

（二）投稿經揭載後，論文書評及譯稿每千字酬五十元。

（三）投寄之稿，如不登載，可以奉還。

（四）投寄之稿，除特別約定者外，以一萬字爲限。

（五）本刊對來稿有删改之權。

思想與時代

第十七期　民國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目次

說同一　張蔭麟遺著
戰後新首都問題　錢穆
哲學與宗教　謝幼偉
歷代之兵源與將才（續）　張其昀
英印的經濟關係　鮑覺民
土壤與人生（書評）　任美鍔
學術通訊　熊十力　謝幼偉

說同一

張蔭麟遺著

此爲張蔭麟先生遺稿，原稿塗改甚多，約寫於民國廿九年或卅年楊全宇正法後，文中有「請以楊案爲例」可證。文實非全稿，此先生生前不願發表，或其理由之一。但經余細讀後，覺此文於形式邏輯上之同一律，有極精審之說，尤於數目之同一，所謂「數同」者，分析至爲精細，實邏輯上不可多得之名作。爰加整理，發表如次。　謝幼偉識

（一）

有名，有義有實。義者名之所示，實者名之所指。名必有義，而不必有實。鳥之名有義，鳥之義有實，鳥之名亦有實。九頭鳥之名有義，而九頭鳥之義無實，九頭鳥之名亦無實。吾人可能分別有二名而只相當於一義一實者，有二名二義而只相當於一實者。若與荼，二名而一義一實。等邊三角形與等角三角形，二名二義而一實。攝氏表之溫度與華氏表三十二度之溫度，二名二義而一實。每甲乙二義只相當於一實時，吾人可分別二義而思之；當其思及甲義時，不須涉及乙義，當其思及乙義時不須涉及甲義；抑有進者，當其分別或合併思及甲乙二義時可以不知二義之只當於一實；抑更有進者，當其思及甲義時，可以不知有乙義，當其思及乙義時，可以不知有甲義。故在實爲一者，在思可以爲二，在思爲二者，在實可以爲一。在實之一，不害於在思之二，在思之二，不害於在實之一。

右說既陳，乃可進而解析所謂「數目之同一」（Numerical Identity）之義。此義以後簡名曰「數同」（並作名詞與狀詞用）。

一俗言之示此義，或單作「同一」，或單作「一」。今謂「甲與乙在數目上爲同一」，或「甲與乙爲數同」，俗言則作「甲與乙爲同一」或逕作「甲與乙爲一」。「數同」者，非名與名，或義與義，或實與實之間之一種關係，而乃名與義，或義與實，或名與實間之一種關係；當吾人言「甲與乙數同」，或「甲數同於乙」（二辭義同）時，其可能之解析，不出二者：一謂甲與乙二名只相當於一義，或甲與乙二名只相當一實。若攝氏表零度之溫度與華氏表卅二度之溫度之類是也。故數同恆爲二以上之名與一義，或二以上之名與一實或二以上之義與一實間之關係。故數同必爲三項以上之關係，而不能爲二項之關係。

俗言則不然，似認「數同」爲實與實或義與義本身間之一種關係。然依此說，則「甲與乙爲數同」一辭當解析爲「甲實與乙實」或「甲義與乙義爲數同」。如是窮蹶必至。夫甲乙二實或二義既已分舉而別標之，是明明爲數異而非數同矣，復謂其爲數同，得非自語相違？有等論者謂數同（此之數同，即彼云同一）之義不離個別

斷之義，必蘊涵其反。其意若曰：吾人若判斷某某爲數同，即同時亦須判斷某某必非數同而相別異。此之自語相違乃基於數同之本義，無可挽救，而亦相違之二判斷，從一義言，可以俱眞。此誠非常可怪之論。溯其原起，乃由拘執數同一義之俗說，而不知其非也。知俗說之非，則此論無由起矣。

（二）

或問曰：一物歷時而存，則先時之此物，與後時之此物，爲一而非二。否則此物已爲二物矣。然先時之此物，與後時之此物，固二實非一實也。有歷時而存之物，則必有二實焉。既爲二而非一，亦爲一而非二矣。請取浙事爲例：官戍部時之楊全宇與在刑場時之楊全宇爲二實明矣。假楊之舊僚有死於其伏法前者，則此人見官戍部時之楊，而不見在刑場時之楊也。當楊伏法之日觀刑之衆，必有不少於是始省識其面者；此諸人等見在刑場時之楊，而不見官戍部時之楊也。若前者與後者爲一實，則此實也，有人焉見之而亦不見之，不見之而亦見之，豈理也哉？故前者與後者必爲二而非一。然吾人又不得不謂在刑場時之楊，即是官戍部時之楊，即不得不謂二者爲一而非二。否則無一楊全宇焉歷官戍部時至在刑場時而存，則煌煌告示中「驗明正身」之謂何？斷曰：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既爲二而非一，亦爲一而非二。此之自語相違，根於事實，無可解免。子欲解免之，其道何由？

答曰：子之推論有躍。由子之說，不能得子之斷。今將分別下列六辭於後：

（一）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二實非一實。

（二）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二人非一人。

（三）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一人非二人。

（四）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一實非二實。

（五）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二而非一。

（六）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一而非二。

（編者按：以上六辭，張先生原稿未寫出，編者根據原稿下文爲補寫如上。）

子所證（一）「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二實非一實，」而未證（二）「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二人非一人。」後證（三）「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一人非二人，」而未證（四）「官戍部時之楊與在刑場時之楊爲一實非二實。」誠於既證（一）（三）以後，能更證（一）實蘊（二），或更證（三）實蘊（四），則所謂不可免之自語相違立矣。今茲未能，而猥在（一）（三）兩辭中，抹去人實，遂臻於所斷，得非躍乎夫？（一）不蘊（二），（三）不蘊（四），小矣。何則？（一）眞而（二）妄，蓋人可知。眞不蘊妄，故（一）不蘊（二）。（三）眞而（四）妄，蓋人可知。眞不蘊妄，故（三）不蘊（四）。

或又曰：（一）（三）分別蘊（五）（六），而在（一）（三

（中，抹去人實，即得（五）（六）。（一）（二）（三）既眞，（五）（六）亦眞，故在（一）（二）（三）中，抹去人實可也。

答曰：從子之說，（一）（二）（三）分別蘊（五）（六），則（二）（四）亦蘊（五）（六）。何則？答「甲乙爲一人，」得蘊「甲乙爲一，」則「甲乙爲二人」，亦得蘊「甲乙爲二」「甲乙爲二實」得蘊「甲乙爲二」，則「甲乙爲一實」，亦得蘊「甲乙爲一」也。（二）（四）既分別蘊（五）（六），而（二）（四）妄也，則（五）（六）亦妄。是則（五）（六）亦眞亦妄，豈理也哉。故知（一）（三）不分別蘊（五）（六），而（二）（四）亦不分別蘊（五）（六）。謬誤論之生，盖由一蔽。即認（一）詞中之「一」與（二）辭中之「一」，示義唯一，而不知其非也。（一）辭中之「一」，乃「同一」之一，即示數同之關係。（三）辭中之「一」非「同一」之一，不示數同之關係。然則後「一」所示者果爲何如關係？曰：此之關係，可名曰「個體上之同一」（Individual identity）簡名曰「個同」。凡言「某與某爲一物」或「某與某爲一人，」或「某與某爲一心」或「某與某爲一我」，其中之「一」皆「個體上之同一」之一，而示「個同」之關係。「個同」一義之詳盡解析，今病未能。今可得斷言者，「個同」乃實與實間之一種關係，而非名與義名與實或義與實間之一種關係。個同不蘊數同，數同亦不蘊個同。（五）（六）二辭若視爲（一）（二）之省，則其中之二「一」示義各殊，「示一數同，」一示「個同，」則二辭實不相違，各俱眞也何害？論者藍視（五）（六）爲（一）（二）（三）之省而忘却（五）（六）中之二「一」，示義不一，遂謂（五）（六）相違。既謂已證（一）（三）俱眞，即已證（五）（六）俱眞。夫吾人既不能不認（五）（六）爲俱眞，又不能不認其爲相違，是有無可解免之自語相違也。知（五）（六）二辭中二「一」之義不一，則所謂無可解免之自語相違，得解免矣。

（三）

於此乃可進而解析舊邏輯中開宗明義之第一律，即所謂「同一律」者。（此律實亦存於新邏輯中，唯表示之方式不同耳。）律曰「甲是甲。」此辭即謂「甲與甲爲同一」之謂矣。不知此所謂同一者，爲名與實或名與義間之關係歟？爲實與實間之關係歟？爲數目之同一歟？爲個體之同一歟？有等論者，謂此之同一，只能爲實與實間之關係，只能爲個體之同一，例如，休謨是也。休謨直譯此辭爲一一對象與其自身爲同一，而論之曰：

在「一一對象與其自身爲同一」之辭中，若「對象」一名所示之意象與「其自身」一名所示之意象全無別異，則此辭實毫無義旨，其中亦不涵一主詞與一賓詞，而二者固爲斷案之不可少者也。單一之對象，只能引起單一之意象，而不能引起同一之意象。

反之，對象之於意識，亦不能引起此意象，不論吾人設想諸對象爲如何相似。人心恆謂此一非彼一，而認彼等爲二或其它一定數目，彼等之存在，完全爲別異而獨立者。

休謨此處所謂「同一」乃指「數目之同一」也。一對象不能有「同一」之關係，二以上對象間亦不能有「同一」之關係。然則「同一律」之義當云何？休謨曰：

吾人不能依任何語言之軌範而謂一對象與其自身之同一，苟非吾人之意若曰此對象存在於某一時者，與其自身存在於別一時者同一。如是則「對象」之名，與「其自身」之名所示之意象有別而不致涉及數目亦不致自陷於絕對之一矣。（右引休謨語，則見 Selby Bigge 編本 Treatise 頁二百及二百一。）

休謨此處所謂「同一」，卻非指「數同之同一」而指「個體之同一」，其所謂「嚴格而絕對之一」則指「數目之同一」也。

案依休謨之說，則同一律之義當爲「若有歷時而存之物甲，則先時之甲，與後時之甲爲同一個體。」案依休謨之見，則同一律反爲「歷時而存之物」之界說。蓋謂（1）「甲歷時而存」即謂（2）「有先時之甲有後時之甲，而二者指同一個體」即謂（1）「甲歷時而存」。（2）特（1）之省耳。然依休謨之說，則吾人不談及歷時而存之物時，同一律卻無所於用。則吾人談辨不涉及歷時而存之物時，而援同一律爲無當，然吾人之談辨有時固不涉及歷時而存之物，而確知於此際援用同一律，絕非無當，則休謨之說不立也審矣。

吾人若視同一律中之同一爲個體之同一，則不得不視同一律爲「歷時而存之物」之界說。此說不可通。而同一之義，不出個同與數同二者，則將視此之同一，爲數目之同一歟？然按依前所陳數同之解析，數同至少爲二名與一義，或二名與一實，或二義與一實間之三項關係。今在「甲與甲爲同一」之辭中，甲與甲非是二名，不示二義，則此辭烏得云及數同之關係？個同與數同，於此均無所施，則所謂同一律者，得非完無義旨之滑稽？

曰：前所陳數同之解析，可廣也。吾人若廣「二名」之範界，使包括一名之兼宜，易言之，吾人若以一名之所宜，亦當作二名，則數同之關係，可施於同一律。同一律中之同一，若以廣義之數同，則其正解當云：「甲名兼宜示義唯一；假其有實，指實唯一。」從反面言之，此辭卽謂：「甲名兼宜，不容分示二義，或分指二實。」更詳釋之，此律若曰：吾人既認定以甲名示某義，或指某實，則以後兼宜此，當亦示前所示之義，或指前所指之實。從反面言之，若曰：吾人若認定以甲名示某義，或指某實，則以後所宜此名，不容別示前所示義以外之義，或別指前所指實以外之實。外此，吾眞不知同一律可更有何解矣。

或曰甲名兼宜，則後分示二義，或分指二實，苟自覺而標明之，何

害？在日常言語之使用中，此容不可免者也，邏輯禁之，毋乃多事？答曰，甲名兩宜，前後分示二義，或分指二實，而自覺標明之，則此前後之甲名，雖貌為一名，實二名矣。甲名兩宜，前後分示義不一，而認為其前後只示一義，或只指一實，以辜推論，此則許多大謬所由鑄，同一律所禁者，此也。

戰後新首都問題

錢穆

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不一定有首都問題，何以故？正為立國體制之不同故。大略言之，國家可分兩類，一為自然國家，又一為人文國家。自然國家亦可稱為單式國家，人文國家則應稱為複式國家。此等國家之分別，一檢地圖即可得之。如西歐古代的城邦國家，其為單式的自然國家，可以勿論。即如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依理言之，依然仍是一種單式的自然國家。即如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諸國，他們都有自然的疆界，環繞着他們自然的民族，此之謂自然單式的國家。無論西歐科學物質方面其文化演進程度高深如何，論其國家之組成，則依然不脫自然單式之階段。惟此之故，英格蘭與愛爾蘭始終不能融和凝合成為一體（其連合殖民地所產之帝國，又當別論。）至於中國，則自秦漢以來，早已脫離自然單一國家之雛形，而進到人文複式國家之階段。所謂人文複式之意識，正指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為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限閡所限。若中國人不能進到人文國家的階段，則如陝西一省，所謂關中四塞，沃野千里，東封函谷，西阻隴坂，南抵秦嶺，北屏河套，正可自為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此即古之秦國。自秦而南有蜀，四川的形勢，北蔽劍閣，東鎖三峽，南不渡瀘，西不踰岷，一樣可為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自列焉以來，在此負嵎立國者亦復不知其幾起。自秦而東為晉，山西的地形，西南帶黃河，東北倚太行，所謂表裏山河，依然可以成一自然單式的國家。雁門之外有代，五嶺之南有粵，皆古之建國。依中國地理形勢論之，不曉得可以劃出幾多的自然國家。中國人的文化演進，在科學物質方面，較之西歐，亦見遜色，然論政治人文，則中國人之偉大表見，實為舉世莫匹。中國自秦以來，早已為一個人文複式的國家，與歐西傳統的自然單式國家大異其趣。此為本文討論首都問題所欲首先提出請人注意之一點。

在自然單式國家裏面，一國之首都，有他顯明的客觀自存的地位，用不着討論。此如英國之倫敦，法國之巴黎，德國之柏林，他們都有他們的自然形勢，交通經濟各方面，有他們的自然價值與自然地位。譬如一人之身，孰為頭腦，孰為胸腹，不辨自明。然使多人集合，如會議，如學校，如軍隊，則孰為頭腦，孰為胸腹，不得不別具意匠，經營創造，而

非自然呈現。因此在人文複式國家裏面首都之選擇實為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個國家之規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首都所在地，時時變動，正為此故。

大抵一個國家的規模和精神，有時取順勢，而有時則取逆勢。有時守靜態，而有時則守動態。取順勢守靜態則為退嬰的時代，取逆勢守動態則為進取的時代。中國的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山脈河流，全從西北趨向東南，氣候則西北寒冷東南和煦，物產則西北苦瘠東南豐饒。因此中國人的東南發展，常在一種順境靜態下面完成之，而不免帶有一種退嬰之象。中國人之西北發展，則在一種逆境動態下面完成之，而亦帶有一種進取之致。若把握住這一個觀念來考察秦漢以來二千年首都移轉之內部的意義，便朗若列眉，一無遁形。

二千年來的中國，秦漢隋唐為一期，宋元明清又為一期。姑以秦漢隋唐為前期，而宋元明清為後期，則前期中國主要在西北，而後期中國則主要在東南。前期中國大體為進取的，而後期中國大體為退嬰的。前期中國的首都常在洛陽與長安，而後期中國之首都則在汴京與北平。南京在前後兩期中均曾取得國家首都之資格[illegible]其重要性。茲再一一分析論之。

秦漢隋唐時代之前期中國，其立國重心尚在黃河流域。當時的立國形勢，則東西橫線重於南北之縱線。戰國以來，即指秦為西方六國為東方。西方以武力勝，東方以文教勝。秦人統一六國，乃西方之武力戰勝了東方之文教。此時秦都咸陽，尚是沿襲舊的自然單式國家（即戰國時代之秦國）之遺蛻。及漢高祖崛起豐沛，平定天下，即天子位於定陶，而建都則在雒陽。雒陽乃東周以來東方之首都，漢以東方人得天下，自願建都東方。時偶婁敬張良勸高祖西移關中，高祖以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其不便。而高祖獨聽婁敬張良之諫，終於長安。其實何奴河南王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而秦中新破，人民稀少。漢廷遂大徙六國之強宗豪族以實關中，此後歷世奉行，成為故事。並定陵寢移民之制度，直到漢元帝時，此制始廢。亦直到此時，關中人戶始充實，何奴外患始平息。中雖稱沃野，然實不足供養一首都。在六國秦時及漢楚相爭時，已頗仰賴巴蜀與漢中。及西漢建都長安，歲漕東方粟，中更砥柱之險，其勞費甚大。其時文化經濟皆在東方，而敵國外患則在西方。漢代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大抵朝廷大臣皆籍山東，而隴西六郡已為邊塞，人習武藝，皆以良家子從軍，備羽林宿衛之選。循此數端論之，西漢之都關中，實取逆勢。若順勢自然則不如都雒陽。一則可遠邊陲風塵之警，一則朝廷官僚皆來自東方，一則可省轉漕輓粟之勞，又一則可省移民徙豪之苦。西漢至元帝時，乃復有主遷都雒陽者，如翼奉之徒是也。此等理論醞釀已久，及東漢光武中興，乃建東都，更不西赴長安。當時如班固杜篤之倫，皆發為嗟嘆。若論軍事形勢，則長安地近羌胡，實嫌豁露，雒陽乃中原腹地，又可反鎖函谷以自固。故東漢常不以邊患為慮，偶

外羌禍，率主護民內徙，朝廷端居，曾不有所發策。然正以此故，東漢常為退嬰的國家，不如西漢之勵進。再以文化風教言之，雒陽素稱中原，關中僻在西戎，板屋之詩，兼葭之詠，其社會之雅健，文教之簡陋，自不能與雒陽相擬。故東部教化關於自生，而西京文物則出人造。諸陵不斷移民，豪富大賈，游俠姦人，五方雜處，風教不醇。西京守三輔者非治劇之能吏不能勝任。東部則人民不待遷而起，風俗不待變而淳。首都附近，三河之郡，豫州潁川汝南梁陳之交，皆人才所薈萃，雲蒸霞蔚，集於京國。東都太學生徒至三萬人，而李膺為司隸，以風度雍容為理。此以較之前漢，若遜乎遠矣。然正因此故，東漢始終於一種清一色的社會，不如西漢異人並[illegible]，常得[illegible]外之人才。故東漢僅能守成，而西漢偉能變。再就大體言之，中國地形，既自西北傾向東南，山脈河流全向東南直注，一切風氣土物，亦削於西北而積於東南。若非有一種人力為之驅策，則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而西北則有衰荒剝落之象。西漢因建都關中，故東方人物經濟不斷向西方輸送，而全國形成一片，血脈常運，元氣常盛。東漢因建都雒陽，東方人物經濟，其西上僅至雒陽而止。函谷以西，受不到東方的暖氣，其本土僅有之人物經濟亦不斷向東流，漸枯漸竭，終成偏痺之症。此為人文國家選擇首都不當因仍自然條件之第一義。再次則中國本為一農業文化之國家，農業文化之長處在純一，在安定，而其病害亦由此生。西漢建都長安，正因為是一個人造的首都，其自然環境本嫌不足，人物經濟皆仰賴外方之接濟，因而其中央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皆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東漢建都雒陽，則純為當時農業文化之本色，雖使國民一時有調洽寧定之感，然純一變而為單調，安定變而為惰退，則如以水濟水，失其調劑。再以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儼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所頭腦在關中，雒陽其胸部，河濟江淮之下游則腹部也。頭腦常在前方，故西漢立國形勢，乃不斷輸送東南胸腹部之人力物力運向西北頭腦部分，經絡向前推進。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之刺激，胸腹包蔽在內，時時有溫暖充全的衛養。東漢則不然，譬之人身，將頭腦倒裝在胸部溫暖安全處，使全身血脈不靈，常見疲緩滯呆之象。在高祖初年，婁敬張良之用心，初不過欲憑藉關中險塞，來應付諸侯跋扈的局面，然乃不期而合於當時大一統建國之規模。東漢刻意振刷文治，開始即都雒陽，未嘗非顧惜社會物力運輸之艱難，並遷就一般東方人的觀念，然而卻種下了半身偏枯乃至疲癃不健的徵候。我們只把兩漢東西都建國形勢之不同，便可說明上文所謂順勢逆勢與能靜能動以及進取與退嬰之相異及其得失所在。魏晉以下，中國人精力物力，更見萎靡，已再無此大氣魄西都長安，他們僅僅逗留於雒陽而止。東晉南渡，北方衣冠盛族，其性如潮水般前擁後擠相率南遷。依中國之地形與天氣，東南移則順，西北移則逆。在東漢時，江浙湘之間，本已不斷開發。東吳割據建業，東晉南朝襲其成規。若長安為中國大人之頭腦，雒陽為心

胸，則建業成了尾巴。若由大人倒轉方向，以建業爲頭部，以長安爲尾巴，則形成了一種逃避畏避之狀態。由建業向長安乃逆勢上趨，非有精力物力之驅邁與支撐不可。由長安向建業，乃順勢下游，不煩排布，自然滑去。桓溫抗志北伐，先議遷都回雒，一時過江名士，聞聲反對，可見當時南方人之意態。北魏崛起平城，至孝文帝決意遷雒，此則又與東漢之都雒用意不同。東漢都雒爲退嬰，而北魏遷雒則爲進取。北魏在上，譬之一人，乃坐北而向南，平城乃其堂奧，雒陽則爲前門。魏孝文決意遷雒，用意初不專在羨慕中國之文化，其另一用心則在以雒陽爲繼續南侵混一江左之出發點。北魏建都雒陽，則其北方人物精力可以不斷向南輸送，積集在雒陽，再往南推進而攫取長江。故雒陽爲當時南北所必爭。桓溫與魏孝文同樣認識此局面。北魏之由平城而遷雒陽，正猶如秦孝公之由雍遷咸陽，俄彼得大帝之由莫斯科遷彼得堡也。然當時北魏已見衰象，鮮卑人已無高瞻遠矚之胸襟與氣度，彼輩樂居故土，畏遷新邑，罕能瞭解魏孝文之遠志。勉強入雒，即沾染了中原萎靡享樂的惡風尚，正是鮮卑人內心枯竭精力已盡之明徵。以當時鮮卑人之惰退萎靡，無法運用魏孝文進取勵進的圖策，雒陽終於解體，而北方重分爲東西兩部。結果依然是在周隋兩朝手裏混一了中國。儻使中國像一件器皿，他是偏向東南傾側的，非在西北部緊扣住一個重心點，他將不得穩定，永遠要向東南方滑下。儻使中國像一顆樹，他的根柢盤固是在西北的，其東南雖則枝葉扶疏，滋膏榮華，卻要靠西北做命脈。儻使中國像一個人，他朝向西北是上進，他轉向東南是後退。東南有享用，西北卻只有磨練。東南有引誘，西北卻只有打擊。東南可資休養，西北則只有奮鬥。西漢人早說過，始事常在東南，而收功實者在西北。中國人向以春夏擬東南，秋冬擬西北。人到西北乃見天地肅凝之氣，若拋了西北，則有春夏無秋冬，有溫和無嚴凝，功實不收，生氣不全。隋唐復都長安，正是中國人經歷長期磨折後，精力復旺，氣魄復振之一個極好象徵。若論長安人力物力，自然條件，依然不夠做首都。隋代開運河，轉漕江淮之米，又於雒陽設東都，皆以此故。若順勢自然，則將如隋煬帝流連江都，樂而忘返。唐代長安之盛況，依然出諸人造。而且當唐之初，突厥正强，鐵騎直到渭水之北岸，唐太宗匆忙中輕騎簡從與之隔水而盟，這是何等緊張的局面。然中國只有建都長安，纔能全身策勵，吸集東南方人力物力不斷輸送到西北去。如此始得混身血脈流貫，精神抖擻。亦惟如此，再得奮發前進，不致懈散惰退。道家長生術有提神化氣，煉氣化神之說，此亦是一個逆勢，一個動態。精神發越，鼓舞生氣。否則順勢，一鬆便漸漸倒塌下去。漢唐兩朝代表着兩期中國之極盛時期，決非偶然。

五代以下，中國又入衰運。只看五代十國中間便無關陝在內，其時中國人物精力，已不再能向西北方鼓進，因此西北在中國史上失卻其應佔之地位。北宋開始混一，然北宋不論不能建都長安，抑並不能建都雒陽，而開始在汴京住下。這才注定了後期中國衰運之先兆。

宋太祖非不想西都雒邑，只因順勢自然，想念到兵糧竭乏，漕運艱難，因此留住汴京。漢高祖初平項羽，即下令兵隊復員，漢初並無餘備大批兵糧之來積與困難，因此一聽婁敬張良之言，可以即日西遷。宋初無此力量，中央政府養兵二十萬，既不能帶兵西遷，又不敢棄兵東駐，只有隨著軍隊遷就糧運，在汴京住下。宋代的建都，雖說順勢自然，其實是無勢可乘。歷代建國，無如宋人之弱者。至於遼金元清四代建都燕京，則又別有因緣。此四代皆崛起中國東北方，燕京正為其進瞰中國之前門。故此四代之都北平，正如秦孝公遷咸陽，魏孝文遷雒陽之故智，取便勵進向前，臨制中原。此四朝之都燕，所為者乃對內之控制，非對外之奮鬥。轉漕江淮以事給養，倚憑北方老巢，作為退步。雖則是同樣吸集東南人物精力向北輸送，而實質不上所謂血脈流貫與精神抖擻。元清兩代之中國，其內裏實分兩體，蒙古滿洲不肯放棄其部族政權之私心，則燕京只為控攝中國之據點而已。明太祖驅逐胡元，定都金陵，若論當時人物精力，固已薈萃江淮下游，在此建都，正如漢光武之定居雒陽，只能是一個靜態的政治。而當時北方強敵未消，不得不特駐重兵，外重內輕，遂來靖難之變。明成祖毅然北遷，始一反太祖之順勢靜態的退嬰政策，而改為逆勢動態之進取政策。明代得有四百年恢張龐大的局面，不得不說是成祖之功。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與元清兩代之建都北京用意不同。元清都燕，如人坐北而向南。明之都燕，則如人坐南而向北。元清其情在控制南方之反側，明人其情在阻北方之入犯。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為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而明代國運，亦甚可與西漢唐人媲美。惟漢唐時代（前期中國）之形勢，東西橫線之重要勝過南北縱線，而宋明時代（後期中國）之形勢，則南北縱線之重要勝過東西橫線，此為其異點。東漢都雒陽，只在東西橫線之中途，未能盡量吸集東方人物精力輸向西方。北宋都汴京，只在南北縱線之中途，亦未能盡量吸集南方人物精力輸向北方。皆不能照顧全局，未能盡量發揮人文國家之機能，故東漢北宋皆為弱國。明代挾南控北，與漢唐吸東注西形勢相似。惟中國地形自西北傾向東南，若重心懸繫在西北，則全身警策，全身靈動。若重心懸繫在東北，則西北一角終難提挈。血脈精神終有一處掉空落陷，終不能全身活潑緊湊。此明代建國規模之有遜漢唐處。若元清兩代，根本又當別論，此為後期中國所以不如前期中國之主要大原因。讀史者能擴開心胸，以遠神眺矚，可悟其意。若循行數墨，則將疑其言之若河漢而無極也。

今再拓開一步論之，吾人從高向下，從冷就熱，從曠大處向狹小處，常有一種舒服安穩之感。反之若從低向高，由暖向冷，從狹處入曠境，則易覺有一種奮進向上之意。而不幸中國人文之大趨勢，則常為由高向平，由冷向暖，由曠向奧。雖若舒服安穩，而奮進向上之意一失，則其民族精神將不免於懈弛而惰退。西漢之與唐明，則在逆其勢而加以策勵與鼓舞。東漢北宋，隨勢自然，則振作無從矣。若以此意看歐

洲史，則與中國適成對比。西歐文化始起希臘，漸次西向而達羅馬。中古以還，又自西徂法而至英倫，最近又轉向大陸，自德抵俄，綜其進向，乃不斷由下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面轉曠大處。故全歐洲史，乃若精力彌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中國則顯然有從高寒曠大滑向低濕稠小之趨勢。然若者若據此而認為中國民族精力懈弛惰退之證，則亦未然。何者，歐洲諸邦始終在自然國家之階段，羅馬雖勝希臘，日耳曼諸族戰勝羅馬，高寒曠大戰勝低濕稠狹之區而[illegible]代也。故羅馬吞滅希臘，日耳曼又吞滅羅馬，彼此即以所吞者自養。其歷史雖遞嬗而下，其精神實互爲起滅，不相通貫。中國史則不然，中國文化乃自始即由高寒曠大處向低濕稠狹而發展，而仍得保持其高寒曠大之命脈與生機。故西歐爲迭仆代興，而中國則屢蹶而復起。根據上述觀點，最近中國之將來，皆有倒挽東南人物精力重新吸向西北之必要。

今就中國史上歷代建都分五區域言之，其在中央者曰洛陽，西北區爲長安，東北區爲燕京，東南區爲金陵，西南區爲成都。其他則不在討論之列。成都僅屬割據，依照地形，斷無全國首都落在西南之理。金陵亦僅偏安，明初雖以南京爲全國首都，只是曇花一現，不作準數。金陵適當長江之下游，譬之人身，當屬臍部，臍部決非首腦之區。北平建都雖亦近及千年，然大體是東北部族政權壓迫全國之一據點，只有明代四百年爲例外。儻綜攬中國全局，又縱揹兩千年立國經驗，則此後中國新首都仍當面向西北，而洛陽自不如長安之適當。茲再分端論其利害：

橫觀全世界各民族，其文化發揚燦爛一時者，莫不經歷相當期間便告老去，因此論文化之士，頗以文化亦如個人生命，有其生老病死之必然經程，而無可挽回。獨中國適成例外。我謂民族究非單純生命之比，若得常有新刺激，常投之新環境，自可不斷有新精力繼續萌生，而此民族遂永獲不老之象。近代之例，如英倫之移民北美，即其證也。中國正因處境闊大，從不斷的新刺激，醞釀出不斷的新精神。約略言之，春秋戰國時代，人文中心實在東部，而齊魯爲之冠。鄭宋已較次，三晉中原又次焉，而西部秦國爲最後。稍北如燕趙，稍南爲楚越，皆不得預於當時人文之正統。即在西漢，依然以山東齊魯爲人文首區，而燕趙梁楚次之。及乎東漢，人文基址漸移而西，梁陳仍往，人文特盛。及魏晉失緒，中原喪亂，人物播遷，經大騷動，於是西北則轉而至甘涼，東北則轉而遼瀋，東南則踰江跨海，西南則度嶺越嶠。中國經此一大騷動，各處均得從新環境下萌茁出新精力。一到隋唐統一，各處風氣湊合，當時的中國忽然生機勃發，氣象一新，正爲此故。然就大體論之，漢唐中國人文，依然重在北部而不重在南部。吳晉南朝之局面，多半乃僑客之力，非江外人文所自創闢。直要到唐中葉以後，江淮人文乃日盛日大。下迄宋代，南北漸成倒轉，江南人文乃始凌駕於大河兩岸之上。明清兩代，尤其是江浙文物，絢爛昌明，達乎極點。然而最近的百年以來，中國在世界形勢之大轉動中間，又不斷開闢了新環境，賦

與中國人以新刺激。浙閩兩粵，因其濱海通商之便利，開始邁步走上新途境，太平天國的一番龍虎鬥，全由湘粵人扮演主角，革命人才，多半屬諸西南。西南洋僑民，尤爲注意近代中國人之新發展者所屬目。最近對日抗戰，西南是我們的大本營。不久的將來，西南諸省，無論人才物力，一定要在中國史上繼長增高，佔得一個嶄新的位置。至於東北，最近百年來，魯豫諸省大批移殖，以他們强韌堅厚的毅力，配上富源無盡的新天地，又値强鄰窺伺，國際風雲動盪衝突，直到九一八以來，淪陷喪亡之苦，使東北人民的內心，更蘊蓄了許多無可言喩的感想。東北人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國史上，早已漸露頭角。目下雖一時沉淪，不久的將來，一定要突飛猛進。其人才物力，均將爲新中國建設時代之一支生力軍。我們放眼一看此百年來之變化，雖則驚心動魄，創鉅痛深，但中國人顯然又在新環境下備受新刺激，在新刺激下醞釀出新精力。此種新精力之表現，即爲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現在放眼一看，長江大河兩大流域的下游，爲燕江浙稱中國自古傳統人文基點精華所萃。燕冀北部，是前期中國漢唐時代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只論山東一省，其人物精力，自古迄今，循上而下，始終站在全國各區域之最前線而未見甚過分的衰頹與纖細。吳越雖較齊魯爲後起，然其人物精力，一樣的站在全國各區域之前線者亦已經歷千年以上之時期。只照中國地形，山脈流，風氣變動，自然傾向，便穩聚到齊魯吳越的一帶。由此而上，爲燕爲遼爲東北。由此而下，爲閩爲粵爲西南。東北西南正在預兆着新中國之新生命。中國最近當前之人物精力，似乎成了一個半環形，正是大陸之邊緣，與海洋交割的邊緣，恰恰成了一個半環，而以齊魯吳越當此半環線之中點。這個半環線劃拱着泱漭曠蕩的大陸。這一個大陸，正是中國人的命脈與生根。無盡無限光芒燦爛的歷史與文化，正在此大陸上產出。漢唐極盛時期最燦爛最繁榮的首都，都在地長安，便是此一大陸之中心。由此向正東向東北向西南，向上面所說之半環地帶，距離約略相等。這一個半環之對此中心，頗有衆星迴旋，八方風雨之概。中國本是一個大陸農國，中國傳統文化，亦是一個最標準最理想的大陸農國的文化。中國人的已往在大陸，中國人的將來依然要在大陸。中國人的已往是農國，中國人的將來依然仍是農國。只不過要成爲一個新大陸的新農國而已。上面所說海陸交割地帶之半環線，不夠代表整個的中國。整個中國尙有恰恰與上述半環線遙遙相對的另一半環，便是以新疆爲中點東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環。依照中國已往歷史，中國人面對這一半環的時候，常是中國人奮進與向上的時候。從中國人反過身來，面對海陸交割的一半環的時候，則雖若順勢自然，却不免帶有些消退與苟安的意味。新中國之最近將來，依然爲一種取逆勢的可能而努力的國家，則新中國建國的第一步，便該再回過身來，重新吸收那海陸交割地帶的全環線上的一切人物精力，倒流到正相對的半環線上去，否則中國終要成一半枯半榮的畸形國家。譬如日月

之蝕，一半光明而一半模糊，一半鮮豔而一半黯澹。不僅如此，中國的中心地域，也正在腐爛腐敗，漸漸如挖瓜瓤，愈挖愈進，中心已空，僅存半皮。長安洛陽從前是中國最光明鮮豔的所在，現在則模糊黯澹，正如爛瓜瓤般，若不挖去，勢將累及皮層。此種情態，中國歷史上也早已經歷過。當魏晉擾攘之後，洛陽長安卒無居人，那時中心地域之腐爛，較今尤甚。中國得此一大變動，因傳統人文基點物力中心之大破壞，人物精力播散四外，入新環境，獲新精力，到後再湊集還歸，綿造出隋唐統一的盛運，而洛陽長安乃如朋日之日實當中天。最近一百年來的中國衰運，直到目前之大抗戰，中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幾乎全部淪陷，全部動搖。中國人在此大變動的新環境之下，只要有魏晉時代人之精神氣魄，此下無疑的便是第二期的隋唐新運。中國人接受歷史的教訓，便該慕效漢唐。中國人依照傳統人文建國的經驗，要用平衡的原理，來使全國人物精力活潑交流，融成一片，中國亦該向內陸西北發展。照農業上輪耕番休的道理，長安洛陽內陸中心，雖在漢唐古代極其光明燦爛之盛事，但此一千年來，已漸漸冷落，漸漸荒棄。長安洛陽雖是古世界，同時卻是新天地。雖非灌溉未墾，卻已返璞回真。若使我們吸集海陸交割地帶半環線內之人物精力重回到漢唐故地，一面固然富於歷史上之懷憬與回憶，一面亦發於是到了新闢的疆土，新創的天地。依然是一種新環境，依然有一種新刺激，依然可以醞釀出新精力，培植出新生命。我們向西北發展，不僅是平面上的平衡，抑且是直線上的滯通。不僅是地理經濟上的交流，抑且是歷史文化上的復活。我們要返老回童，要在逆勢與動態下重新從低下的窪暖的所在爬上高峻的寒冷的故鄉。我們依然要從小地面復歸到大地面去。這是我們的奮進與邁上，這是民族之再生。

再以國防觀點論之，中國歷來大敵外患在北不在南。無論是西北或東北，總是踞高臨上，佔着大地面來掩着小地面。中國的南方，象徵着和平進展，北方則象徵着奮鬥競存。已往如是，最近的將來依然要如是。人類的大戰爭仍將在大陸上展開。國家民族決生死的戰爭，必在大陸上演出。中國是一大陸農國，將來工農配合發展，決不怕海疆的封鎖。在此民族思潮澎湃橫溢的時代，使着幾十條海上船艦，運載少數軍隊，可以滅人併邑，此事幾難想像。中國人只要暫不攫奪海外殖民地，中國的國防，主要的必是陸空配合的大陸國防。即是北方國防線。中國北部大陸陷入敵手，則中國人將被趕入海裏，宋明如是，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蠻族之於羅馬，形勢亦復如是。我們若采用西漢與唐代逆勢勵進的國防形勢，則將來中國新首都亦有向北遷移之必要。否則中央首腦安居江流狹仄的安全區域，斷不能極度發揮大陸奮進的戰鬥效能。若果效法隋唐東西兩都的形勢，則新中國之建都，應在長安，而以北平為陪都。從長安到北平劃一橫線，約略相當於黃河平原之地帶，即代表前期中國漢唐精神的地帶，應便成為新中國之首腦指揮地帶。全國青年受國家政治教育宗教哲學各種

門精神方面的訓練培養者，以集中此地帶為相宜。壯闊的地形，嚴肅的天象，深沉古老的歷史文化之遺跡，全在此地帶上。這一地帶表示着中國民族之堅毅強韌篤厚偉大。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師，大軍人，全應在此地帶受洗禮。自此以北，益高益冷益曠益大的邊疆區，應成為新中國之兵庫。萬里長城即其最好的象徵。新中國人應在此帶建設新的萬里長城。自此以南，以五嶺山脈為界線又可劃成兩橫線，即是長江平原與珠江平原之兩地帶。前一地帶是代表後期中國宋明精神的地帶，此一地帶應使成為新中國之胸腹營養的地帶。文藝美術科學工業應在此一帶發皇。此一地象徵中國民族之活潑溫良清新智巧，這是家宅中之花園區與書房區，不信在此建立大禮堂與紀念碑。最南一線，代表着近代中國之新興精神，與大海相吞吐，與世界相呼吸，工商製造，往來貿遷，這裏象徵着新中國之動盪將與最北一線象徵新中國之凝定者遙遙相對。將第四線配合第三線將第一線（最北一線。）配合第二線。古今中外一以貫之。人文建國之平衡凝結，勢必如此形成。若戰後新首都仍逗留在第三線上，雖亦順勢自然，博得大多數國人之贊成，並取到目前一時之便宜，然而人文國家的大體製，歷史國家的大精神，終將無從發揮，到底抉發不出中國民族內心深處的至高情感。勢將逐步退墮，逐步偷惰，南方兩線上的人文重點物力中心永遠推送不到北兩線去。尤其是中國的西北角，中國山川形勢祖脈所在，中國文化歷史漢唐盛業由此造成，現代中國之中央地帶，亞洲大陸衝盪鬥爭的大局面，萬一在此開幕，偏在東南角江海邱陵小局面下之人物精力，必將無此指揮駕馭的大力。要運使長刀闊斧，非得騎上馬背。若徒步小坐，縱有神力，亦無刀斧迴旋之餘地。我們用歷史的藝術的軍事的政治的哲學的文化的經濟的地理的各方面各條件的眼光與理論來衡量戰後新中國之首都問題，斷然應向北遷移，尤其應該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二偏隅，大陸重於海疆，則長安應為首選。若其現在的荒涼破壞則不足為我們討論百年建國的大政方針之一難。

哲學與宗教

謝幼偉

自人類文化之演展言，先有宗教而後有哲學。哲學導源於宗教，而非宗教導源於哲學。此則不論贊成宗教與否，當可共認。美哲霍金教授嘗謂「宗教為一切藝術之母」（見所著：神在人類經驗中之意義一（據十四頁））其言或非過甚。以事實上，宗教確為文化之源，一切文化皆可溯源於宗教。如科學，哲學，音樂，禮節，舞蹈，立法等，歷史上悉與宗教有關，悉曾在某一時期內，純粹為宗教之用。今各種科學雖與宗教脫離而獨立，然其與宗教之關係，則不能否認。此非重視宗教，即不重視宗教者，亦不能否認其歷史的地位。實驗主義者孔德氏嘗

人類思想之進展爲三期，一爲神學期，二爲玄學期，三爲科學期。此仍視宗教與哲學爲原始，宗教在先，哲學在後也。此宗教與哲學之歷史關係，及其性質之異同，即爲本文所思探討者。

宗教問題在歷史上實與哲學問題相同。宗教之初級爲神話。神話所企圖解決者，爲宇宙及人生問題。哲學所企圖解決者，亦宇宙及人生問題。彼此之問題不異，所異者，乃其答案。邃古人類，見山川河嶽之奇，覺風雨雷霆之異，感人事無常，人生如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無不思有以明其故，而求其理。於是乃有所謂神話。神話之產生，乃人類對自然界及人事界各種現象之一種最初步的解答，哲學之解答，比之但較爲進步而已。換言之，神話乃人類訴諸超自然及超人類之各種勢力，以說明自然界及人事界之各種變化，同時復將此各種勢力人格化耳。例如，在神話時期，風有風伯，雨有雨師，雷有雷神；此即因人類不明風雨雷等之產生與變化，而思以風伯，雨師，雷神等，爲之說明。吾人雖可認此種說明爲不合理，爲非哲學的，然吾人不能不承認其問題實亦哲學家之問題。由神話進而爲宗教，由宗教進而爲哲學，答案雖不同，問題則相同也。

哲學與宗教之問題相同，則哲學之異於宗教者何在？德哲鮑耳生謂哲學與宗教之區別，可依兩種原理而分：一爲主體方面之異，一爲機能方面之異。自主體言，宗教之主體爲集體的心靈，集體的心靈乃一切宗教概念所從出，反之，哲學之主體，則爲個別的心靈。宗教以團體爲主創造之者乃一團體或一民族之共心，決非純出某一個人有意識的工作。猶如語言與民歌然，乃由民族意識之演化而成。故任何宗教，皆非某一個人之創造品。佛教，基督教，回教，雖各有教主，然此等教主，嚴格言之，僅宗教之改革者。彼等僅將某一民族原有之宗教觀念，加以改造，而成立新教，實非憑空而成立新教。哲學不然。哲學雖亦與團體有關，雖亦受時代影響，然哲學之產生，究爲個人的，究乃個人心靈獨自努力之結果。哲學乃哲學家之哲學，非哲學家，即無哲學。有柏拉圖然後有柏拉圖之哲學，有亞里士多德然後有亞里士多德之哲學。此二人之哲學，即爲此二人所創。歷史上如少此二人，歷史上即少此二人之哲學。談哲學以個人爲重，談宗教則以團體爲重。此其一種主要之不同點。

自機能言，哲學乃思索的，追求的心靈之產物，而宗教則爲詩的幻想之產物。宗教之解答宇宙問題，常先幻想各種超乎宇宙之勢力，或幻想另一宇宙。然後將吾人之宇宙現象，與彼所幻想者，發生聯繫，其所企圖解答者爲宇宙之來源問題，或何故有宇宙之問題。哲學之解答宇宙問題，則着眼於宇宙現象之本身。哲學就現象而研究現象爲何物，及論究現象如何變化。換言之，哲學目的在追求現象變化之規則，在獲得現象定律之知識，再由此知識，以說明現象之變化。吾人可謂哲學與宗教之總問題雖相同，而其特殊問題則不同。宗教之特殊問題爲：宇宙何故有此現象，因幻想各種特殊勢力或上帝，以

說明之。哲學之特殊問題為：此現象究為何物，及究如何表現，因就現象之本身而求其原理與法則，以說明之。以故，宗教之解答，根據幻想；而哲學之解答則根據理論與事實。由之，從事哲學活動者，須從思想出發，且乃思想之努力。而從事宗教活動者，則由信仰出發，實為信仰之結果。此亦一種主要之不同點。（參閱鮑氏哲學概論英譯本三至十五頁）

鮑氏此種區別雖無可議，然哲學與宗教間，據作者觀察，尚有其他重要之不同點在，為吾人不可不知者。第一，宗教必有崇拜之對象，必維持其神與人間之對立，而哲學則否。宗教不能無崇拜之對象，雖此崇拜之對象可極不相同，可為蛇，為石，為日月，為木偶，為一神，為多神，然其同為崇拜之對象則一。且此崇拜之對象亦同為神聖不可侵犯者。次則，宗教雖亦有神人合一之企圖，然宗教之存在，則全恃此神與人間之對立。如神人無別，即不必有所謂宗教。哲學不然，哲學固不必有崇拜之對象，即有之，亦非神聖不可侵犯者。至其追求本源，則志在與本體為一。事實上，不必有一物與之相對，而惟謀本心之自明自覺而已。故在某一意義上，吾人可謂宗教為有對的，而哲學為無對的。第二，宗教為出世的，而哲學則不必為出世的。任何宗教，皆有出世傾向。彼等雖亦有熱心救世，積極在人間活動者，然其視人間，始終認為虛幻，為不實，為汙濁，與另一世界，根本不同。彼等之活動於此一世界，目的全在為到另一世界之準備。哲學之於人世，固亦有視為幻象者，但多認此幻象為本體之顯現，與本體不二，故少出世之念。第三，宗教必依賴儀式，無儀式不成其為宗教。宗教如取消儀式，宗教或無存在之可能。哲學不然。哲學可謂絕對不需要儀式。有儀式之哲學，即非哲學，而只為宗教。第四，宗教之態度為武斷的，不容許懷疑之存在。吾人之於宗教教義，惟許信仰，而不許懷疑或批評。批評或懷疑宗教教義，即被視為異端，而須受宗教上之處分。（國人之固執先秦儒術不容批評或懷疑者，其態度亦為宗教的。）在宗教範圍內，實無思想自由之可言。哲學態度則與之相反。哲學態度為懷疑的，容忍的，絕對容許思想之自由。在哲學上，不論何人之思想，皆可批評，皆可懷疑。哲學家且樂於接受他人之批評與懷疑。批評或懷疑哲學家之思想，少有被敵視或被處罰之危險。凡此區別，皆有關係，哲學所以時與宗教衝突，及哲學所以不能代替宗教之理由，即在是也。

以故，哲學雖導源於宗教，然實由人類對某一流行宗教之反抗而起。人類不滿意宗教對宇宙及人生問題之解答，而思自行解答時，即為哲學思想之萌芽。哲學思想之產生實產生於人類脫離團體思想之束縛，而謀獨立運思之結果。人類感覺神話或宗教之解釋不合理，同時復有勇氣表示其個人意見，不以違反教義及反抗團體為慮，乃為思想自由之開端，亦哲學思想之開端。哲學實濫觴於個人思想之自由。哲學與宗教之爭，自始即為思想自由之爭。哲學與宗教之關係，亦自始即為敵對之關係。哲學之有今日，乃哲學家曾流血抗爭而

成者。蘇格拉底之飲酖而死，死於其不肯犧牲個人意見以從衆也。加希臘人之所死蘇氏者，亦謂蘇氏反抗其時之宗教意見也。哲學與宗教間之衝突，史不絕書。著名哲學家之因宗教團體所興罰者，不知凡幾。布魯諾之被焚死，斯賓挪莎之被放逐，則其著焉者。此種衝突，在西洋方面，雖至今日，仍不能謂已完全停止。今日哲學家之意見，苟與流行之宗教教義相反時，仍被宗教家視為危險思想，而加以排斥。一種哲學思想之受歡迎，非徒因其為眞理，亦常因其合乎流行之教義。哲學家苟欲避免與宗教衝突，唯一方法，即不談與宗教直接有關之問題，如上帝存在及靈魂不朽等，否則，即須表示其贊成宗教意見之態度。其直接批評宗教教義，而表示其反對態度者，殊不多覯也。

哲學與宗教，所以發生衝突，其理由一方面固與前述兩者間之區別有關，一方面亦由兩者間之關係過密有關。哲學與宗教間之關係過於密切。宗教所欲解決之問題，常即為哲學所欲解決之問題。宗教對宇宙及人生，有其特殊之見解。此特殊見解，在宗教家，乃堅定不易之見解，乃絕對恆常之眞理，不容任何人之懷疑與批評者。同時，此種見解，往往有其悠久之歷史，深入人心，為一團體或一民族之大多數人所共信。此民族共信之見解，苟受批評，而發生動搖，影響所及，社會秩序，或民族道德可因而瓦解。宗教家為保障民族共信，而維持社會秩序起見，不能不敵視違反宗教見解之思想，此為宗教家之苦心孤詣，實未可厚非。故宗教家雖以至殘酷，至嚴厲之方法，處置異端，社會人士不惟不表示驚訝，反多從而贊助之者。蓋以宗教家所代表之意見，常即社會大多數人之意見，違反宗教家之意見，無異違反社會大多數人之意見。哲學家對宇宙及人生，常持與宗教相反之見解，此為發生衝突之主要原因。加以哲學見解為個人的，而宗教見解為團體的，哲學與宗教衝突，即個人與團體衝突。宗教以其深長之歷史，恃其團體之力量，或深閉固拒，不容非難，誠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歷史上，哲學之屢受宗教制裁，及宗教家之所以睨視一切氣焰逼人者，亦即團體力量之耳。

有團體力量為後盾，哲學不與宗教發生衝突則已，如發生衝突，則失敗者常為哲學。但哲學之失敗為一時的，眞理終有抬頭之一日。哲學所代表，若果為眞理，則一時雖受壓迫，最後勝利，必屬哲學。蘇格拉底之學說，不以蘇氏之死而消滅，反因蘇氏之死，而發揚光大。宗教之對待哲學，其始雖每以壓迫摧殘為能事，然見壓迫摧殘之不能生效時，亦逐漸改變其態度。歐洲中古時代，宗教家即從事臣服哲學家之工作。一方面宗教家力謀其本身教義之合理化，將哲學思想結合於教義中；一方面則要求哲學家使為宗教之辯護者。其時哲學，自今日觀之，雖亦有極大之貢獻，然一般言之，所謂中古哲學，莫不染上濃厚之宗教色彩，謂其為宗教女僕，或非過言。然哲學終不能永受宗教之束縛，文藝復興及啟明運動後，哲學又恢復其獨立與尊嚴。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宗教更受嚴重之打擊。故今日宗教家之氣炎，已遠不如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之國。中興諸大將岳飛而外，韓世忠陝北人，劉錡與吳玠吳璘兄弟皆甘肅人。兵源與將才相聯之故，大略可見。蘇軾云「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以抗衡於上國」南渡以後，四川為上游根本，江浙為畿輔重地，如浙省之宗澤，四川之虞允文，皆為傑出之名將。

宋高宗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為失體，縱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為謀叛」（續通鑑建炎四年）宋代國力不競，馴至衰亡，其原因在於兵役制度，茲不具述。重文輕武之習，以南方為尤甚，宋亡後，馬可波羅遊歷杭州，其記載有曰「行在城之居民，舉止安靜，蓋其教育及其國王榜樣使之如此。不知執武器，家中亦不貯藏有之。諸家之間，從無爭論失和之事發生，縱在貿易製造之中，亦皆公平正直。男與男間，女與女間，親切之極，致使同街居民儼與一家之人無異。」（見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中冊頁三八二）此種有價值之文化而無相當武力以保其生存，痛悔何及。顧宋之末季，各地義軍紛起抗敵，實足以吐民族之正義，而以贛南尤為卓越，文信國公即其代表人物。岳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誠哉斯言。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河北靈壽，在正定西北）傳聞強識，謙恭不伐。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伐蜀，兩川平，帥還，彬裝中惟有圖書而已。七年將伐江南，彬先赴荊南發戰艦，順流而東，潘美（字仲詢，河北大名人）帥步兵繼進，八年克金陵，南唐降。史稱曹彬下江南，秋毫無所犯，不妄戮一人，市不易肆。及全國統一，彬乃嘗北伐契丹而無功，太宗賫恨而歿。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南下，汴京震動，議遷都以避之，時寇準為相（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今陝西渭南）力沮其議，勸帝親征，帝盡以軍事委準，渡河幸澶州（河南濮陽）以示卻敵決心，契丹知不得逞，乃休戰議款而去，是謂澶淵之盟。此次和約，宋輸歲幣帛於遼，但兩國稱為兄弟之國，宋為兄，遼為弟，體制未失，與後來宋金和約，金人稱叔，宋人稱姪者，判然有別，能戰而後能和，此顯易也。

宋以恆山與遼人分界，晉及民間之楊家將故事其背景即在此綫。楊業并州太原人（山西太原）屯兵備遼，屢破強敵，契丹望見業旌旗輒引去。太宗雍熙三年（九八六）雁門（山西代縣北）之戰，以主帥敗約，援兵不前，業率孤軍力戰，身被數十創，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絕食三日死。業素得士心，部卒不忍去，無一生還者，其子延玉亦沒焉，聞者皆流涕。業有七子，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智勇善戰，號令嚴明，與士卒共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在邊防二十年，契丹憚之，目為楊六郎。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山西汾陽）起於行伍，與楊業同。范仲淹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行軍正部伍，明賞罰，其計畫必審中機會而後發，是以所向有功。仁宗時，廣西有儂人（操泰語）之亂，其酋儂智高，自鬱江上流邕州（南寧）順流而東，且遂廣

州，嶺南騷然。狄青率諸軍進討，克賓州（賓門）崑崙關（邕寧東北百里）一役以謀略獲大捷。皇佑五年（一〇五三）賊平，拜樞密使。青還朝，命岑仲淑（今浙江餘姚人）留鎮邕州，經理善後，威惠並行，開拓疆土，撫綏士人，大得民心。廣西田州（在百色東）思恩（在武鳴北）泗城（凌雲）等處岑姓土司皆仲淑之裔孫也。（見王守仁泗城土司世系考）

北宋邊患，在西北爲西夏，是乃唐代胡籍藩鎮之最後遺孽。西夏係黨項所建之國，與吐蕃同屬藏族，（黨項即古代羌之化音，舊唐書云，黨項羌漢西羌之別種也。）據有今寧夏甘肅青海一帶之地，都城即今寧夏省會。宋仁宗時西夏驟強，范仲淹（先世陝西邠縣人，後徙江南，爲吳縣人，）韓琦（今河南安陽人）皆以名臣主持陝西軍事，開府涇州（甘肅涇川）爲夏人所畏，但亦不免於議和議款。神宗時，王安石當國，銳意有爲，欲以恢復河湟爲規取西夏之本。熙寧六年（一〇七三）命王韶（今江西德安人）收復熙（臨洮）河（臨夏）洮（臨潭）岷（岷縣）疊（疊部）宕（今岷縣之宕昌鎮）六州，拓地頗廣。但不久元豐五年（一〇八二）陝北延州一役，宋師敗於永樂城，（今米脂縣西）史稱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六萬人，神宗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宋室南渡，河隴盡陷。

南渡之初，李綱圖恢復中原，以爲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襄陽與南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其論南陽曰，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綱字伯紀，今福建邵武人，自其祖始居江蘇無錫，歷仕徽欽高三朝，值國難深重之時，以一身用舍，係社稷生命安危。其生平奏章，大抵備邊禦敵之策，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北宋二百年間，唯強敵之變，皆得人以任之。真宗時契丹之變，寇準任之，仁宗時西夏之變，范仲淹韓琦任之，靖康金人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李綱亦慨然以身任其變。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惜身或不用，用或不久，良可慨也。

南宋高宗即位，宗澤與李綱皆首先被召入對，言興復大計，二人持論相同。史稱宗澤力請高宗還汴，其奏劄規劃時勢，詳明懇切，皆時沮於和議，而偏安之局以成。澤字汝霖，今浙江義烏人，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受命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撫慰汴民，政績卓然，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澤方身任中興之事，修明軍政，結諸路義軍，連燕趙豪傑，以圖北伐，而爲權臣汪潛善等所阻，凡所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歿。當易簀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死而後已。初澤在汴都，岳飛以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今汜在河南中牟附近）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著名。

當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岳飛方隸宗澤部下，其後歷編裨至大將，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壓金人。忠義智勇，文武全器，中興名將推爲第一。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今河南安陽）家貧好學，尤好左氏春秋，宣和四年（一一二二）以民軍應募，年才二十。宗澤以飛好野戰，非萬

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帝是其言。飛行軍有紀律，號令如山，嘗謂用兵必先定謀。紹興四年（一一三四）飛奏請及早反攻，勿使偽齊日久坐大，驅除不易。紹興五年，飛遣使結納兩河豪傑，以待王師，命人動息皆得其詳。當時太行山一帶多民軍主要根據地，飛盡聯之人，故深知其情實。紹興七年，復奏請出師，略謂敵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但人心終不忘宋，攻討之謀正不容緩。（見論恢復疏）又謂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飛主經營河北，收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命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高宗謂飛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紹興十年，岳飛大敗金軍於郾城，（河南郾城縣北一十里）進軍朱仙鎮，方指日渡河，而宰相秦檜忘仇忍恥，自棄其土，令公班師，公自為表答詔，忠義之氣流出肺腑，與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紹興十一年九月，公下大理寺獄，十一月宋金和議成，劃淮以北棄之，十二月飛死於獄中，天下冤之。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河遁，而詔飛班師，若飛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仗拔殄之衆而激之，恢復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雖不免於東市就戮，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說，而未得其實也。明人徐有貞辨之曰：「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先零，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之協耳。不然如孔明之受托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綦，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公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公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精忠廟碑）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徐氏之語實為確論。且古之大將多有驕橫無禮自取敗亡者，其公忠謙遜，爾高不伐，史冊多稱之。飛不惜以十年之功隳於一旦，不忍舉兵為抗拒，俯首以聽國家之命令，以軍人道德言，斯為自古名將之極現，而足以激發後人之深感。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為之扼腕傷歎，雖勛業未竟於生前，而聲望益彰於身後，足徵公論之在人心也。飛在南渡諸將中年最少，卒時年三十九。子雲，從父征伐，數立奇功，同死獄中，年僅二十一。孝宗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飛官爵，以禮改葬，淳熙六年（一一七九）謚武穆，寧宗嘉定四年（一二一一）追封鄂王。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陝西膚施）家近西夏，徽宋崇寧四年（一一〇五）禦敵有功。宣和二年（一一二〇）方臘反，據睦州青溪峒為巢穴，（今浙江淳安縣西七十里之威平洞，）破五十二縣，殺居民二百餘萬，杭州縱火六日，東南大震，世忠移北伐之師以討平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鎮江黃天蕩之役，大陷金人，世忠以海艦邀泊金山下，梁夫人親執桴鼓，是役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兀朮遁走時，謂南軍使船如使馬，自此不敢窺江南。其後引兵渡淮，聯戰

屢捷，駐兵山陽（江蘇淮安）撫集流亡通商惠工而金人不敢犯一時韓岳並稱岳飛寃獄起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言問。岳飛既死，世忠亦解兵柄，杜門謝客，終老西湖。

甘肅靜寧（宋曰德順軍）以區區一邑而產南渡三大將，即劉錡與吳玠吳璘兄弟。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紹興十年（一一四〇）六月有順昌（安徽阜陽）之捷，錡以潁河孤壘，力挫敵鋒，兀朮狼狽逃遁。同月吳璘有扶風（陝西扶風）之捷，同年七月岳飛有郾城之捷，錡功尤著。史稱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府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十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岳飛奉詔班師，奏留錡掌兵，不許，錡亦南歸。宋金和議雖成，但金人屢次失信，盟墨未乾，即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南犯，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後病歿軍中。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當南宋初年，戮力同心，扼守秦嶺，以保四川，功效卓然。靖康亂後，關中淪陷，紹興元年，金人攻和尚原（寶雞西南三十五里）玠兄弟以死守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後以餉饋不繼，別營仙人關（甘肅徽縣境內）以防金人深入。四年敵騎十萬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兄弟据險抗敵，轉戰七晝夜，終不得逞。兀朮本謂巴蜀可圖，自經此役，乃不敢妄動。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卒於仙人關。璘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雨。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璘著兵法二卷，號兵要大略，大致由據宋金形勢，發微我之所長，乘隙而用之。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四川仁壽）早歲以文學顯，秦檜當國十八年，時蜀士屏棄，檜死，允文始起用。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人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兵，允文督戰於采石磯（安徽當塗西北二十五里）率水師奮勇力戰，大敗金人。是役也，敵軍實四十萬，宋軍才一萬八千。允文恐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復赴鎮江，治戰艦，扼大江之衝，未幾金主亮為其下所殺，金人遁去。允文赴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時金國方亂，允文力主出兵，謂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又謂恢復莫先於陝西，乃至蜀與吳璘講經略中原。孝宗即位，銳意興復，允文往來兩淮荊襄秦陝之間，無寧歲，撫馭諸軍，悉心規畫，出入將相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史稱赤壁一戰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於此。

文天祥字宋瑞，今江西吉安人（吉安縣城東南八十里有市曰富田，即富田里，有所謂文山者，即文丞相故里。）年二十登狀元，年三十六致仕，時權奸在朝，忠謀不聽，退休林下。年三十九起知贛州，明年杭都告急，天祥奉詔勤王，舉兵入衛，拜丞相之命，杭都既陷，崎嶇嶺海間以圖興復。後二年天祥在潮州被擒，明年崖山之役宋亡。又三年

天祥死於燕京，年四十七，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也。（一二八二）方天祥捧勤王之詔，在吉安糾合民兵，一時義士雲集，有衆萬人，是爲其基本軍隊。此輩或從征，或扼守，奮身不顧，傾家不顧，雖國事已去，猶抗戰三載，其忠骨可碎，而鐵心不腐，固由丞相忠誠所激發，亦足見民力之可用。今山以丞相忠烈，合爲一傳，二千年間殆不兩見。

陸秀夫字君實，今江蘇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從家鎮江。登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文天祥榜進士第，時年十八。至元十六年（一二七八）奉宋主昺遷南海之崖山，（即崖門山，在廣東新會縣南百里大海中。）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盡出其手。十六年二月蒙古兵由海道進攻，是日昏霧四塞，宋師戰敗，秀夫朝服抱宋主蹈海而死，後宮及文武官從死者以千數。昔者六朝之時，北府之兵號爲天下精兵，宋室南渡，屯大江於江上，京口名勝之迹，皆爲將寨所占。厥後江上諸帥多生於此，亦江山之秀，不在此而在彼也。

（六）遼金元

北方之游牧族，人民生長鞍馬，長於騎射，習於武事，俗尚驚悍，人多沈雄，勝甲冑者盡服兵役，人人能戰，舉國皆兵，上馬則馳突，下馬則牧畜，生活簡單，用兵神速，此其所以多勝也。蒙古騎兵最稱精銳，高山窮谷皆可到，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所至如擂枯拉朽，蒙人以馬乳乾酪爲食，其耐寒暑雨雪饑餓，故屯數十萬之師，張幕露宿，不用運餉，及秋高馬肥之時，有長驅直入之功，此其所以能鞭策歐亞震動世界也。

遼金元三代，本族人口甚少，其軍隊皆包含敵僞兩部份。敵軍指本族及其他北族，僞軍則指漢人被其俘掠而歸附者。本族之親軍皆精兵銳卒，乃一代武力之所寄，復利用他族之兵以供其驅使，故能以寡克衆。如金人伐宋之役，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及得志中原，又以國人駐防內地，以資鎮壓。遼代御帳親軍以純粹契丹人爲之，金承其俗，元代名曰怯薛，（本波斯語，禁兵之意）亦專用蒙古人。親軍之健全與否，爲國運盛衰之所繫。元之初興，怯薛與甲堅利，教練完習，所勝攻取，所向無敵。數世之後，怯薛偷游放縱，頹廢而不堪用，不能衛國，適以禍國，而元遂亡矣。

契丹一族，源出鮮卑。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契丹會長窟哥來朝，翌年舉部內屬，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唐時契丹叛服不常，然不能爲大害，安史之亂，擾動全國，至京師不保，前後凡十餘年，其所憑依之勁旅即爲契丹人。同時平亂之大將曰李光弼，則契丹人同化而服官於中朝者也。唐時西北有突厥回紇相繼稱雄，至唐末五代，二族衰微，契丹乃乘時勃起，稱國號曰遼。至其所以强盛之故，實由乘中國內亂，招徠漢人，尤以幷汾幽薊人爲多，成爲農牧雜居之狀態。契丹一代操兵柄者不出耶律與蕭二族，通婚大都限於二族之間。耶律一姓因西遼河（即西喇木倫河）而得，斯河乃其發祥重地。（遼之國號亦採遼水義）蕭氏即述律氏，出於奚族，契丹之別部也。遼

之建國始於遼太祖神冊元年（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九一六）後二年，定都臨潢，（今熱河林東縣）稱曰上京，是爲太祖阿保機之創業地。後二十年，太宗耶律德光助石晉滅後唐，得燕雲十六州之地，乃以幽州爲燕京，時在石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三七）北平之建都實始於此。遼與北宋相抗衡者歷二百年，以白溝河爲界。今察省張北縣之安固淖爾，爲遼代之鴛鴦濼，契丹南伐常於此駐兵。至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遼爲金所滅，契丹亡國後，漸同化於漢人。

東北唐時有渤海國，國都臨忽汗海，（即鏡泊湖）今吉林寧安西南七十里，渤海城址往往可認。其國爲唐之屬國，薰習唐化至深。渤海爲遼所滅，女眞繼起，亦以松花江流域爲根據地。女眞即古之黑水靺鞨，原屬渤海，其皇室完顏氏，其先實出於高麗之金氏，入居黑水靺鞨，並娶部女，其後裔遂從母姓。金太祖阿骨打於宋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渡淶流河（今拉林河）與遼人大戰勝之。立碑紀功，（今吉林扶餘縣之石碑崴子）遼金之遞嬗始於此役。翌年建國號曰金，都於會寧，（今吉林阿城縣）後十年太祖舉兵滅遼。太宗吳乞買時復滅北宋，靖康二年（一一二七）汴京淪陷，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伐宋之役功爲第一，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宋金和議，實爲吾民族有史以來之最屈辱之條款。會寧爲金之創業地，歷太祖太宗熙宗三朝，至海陵貞元二年（一一五四）始遷都於燕，自是浸染華風，而漸失其故俗。燕京金代稱爲中都，及蒙古南侵，中都不守，又南遷於汴，距靖康之亂前後約九十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金爲蒙古所滅。金亡以後，關外之女眞族仍返於騎射爲業之部落生活。清代當太宗以前，滿洲皆自稱女眞，太宗特下令禁止，此後自稱滿洲，女眞之名自此始絕。

唐代興安嶺西額爾古納河沿岸之蒙古族西遷而居於三江之源，三江者即斡難河，（鄂嫩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即額爾古納河之上流）與禿剌河，（土拉河爲色楞格河支流）皆源於肯特山。其地已近西伯利亞森林帶，故蒙古族長於圍獵，其圍獵即爲出兵之練習。元太祖鐵木眞崛起漠北，併吞塞外諸部落，乃大會諸部於斡難河之源，稱成吉斯汗，時在宋寧宗開禧二年，（一二〇六）鐵木眞年方四十四歲。其後滅夏討金，遊牧西域，深入歐洲，建立空前之大帝國，全國各地均有驛站之設立，以便行旅。成吉斯汗歿時，各地奔喪而來，遠者三月始達。太宗窩闊台六年滅金，奄有中國北部，明年（宋理宗端平二年即一二三五年）始興都於和林，其地在杭愛山（即古之燕然山）東麓，鄂爾坤河（色楞格河上流，元時稱和林川）之源。和林即黑林，譯之音，附近多松林，故名，唐時回紇故鄉即在其地。太宗定宗憲宗三代，皆都於和林。憲宗蒙哥元年，（理宗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命皇弟忽必烈治漠南漢地民戶，始建開平府，（即今之多倫）後稱爲上都，故灤河上流亦稱上都河。至世祖至元元年，（理宗景定五年，一二六四）乃遷都於燕，是爲上都，立國號曰元，至元十六年（

一二七九）宋亡，南北混一。元代兩都並建，世祖每年嘗以二月赴上都，九月還大都。至和林則爲嶺北行中書省所治，然忽必烈在世之時，杭愛山以西成吉斯汗諸子所建之國，已多成爲獨立國之性質。元亡以後，順帝退保和林，終明之世，猶襲汗號。

蒙古兵力震鑠歐亞兩洲，在蒙古騎兵所向無敵之展擴中，中國爲其所遇惟一堅靱之勁敵，故運用其偉大之戰略，分爲若干步驟，始達統一中國之目的。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備載歷代用兵之策略，而於元代之戰略尤所稱道，試略述如左。

（一）攻北平　居庸關爲北平最大之要塞，古人所謂一有不虞，會傾國以爭之者也。元太祖四年（宋寧宗嘉定二年一二〇九）攻居庸，金人拒守不能入，成吉斯汗則趨紫荊關，（在河北淶源縣境）敗金兵於五回嶺，（在易縣西南）遂拔涿易二州，遣別將自南口反攻居庸破之。元人所謂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是也。燕都遂入元人之手，金人遷都開封以避之。

（二）攻開封　成吉斯汗歿於甘肅六盤山，卒時謂其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於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即開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師，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後果如其言而金亡。其用兵路線由鳳翔經大散關，越秦嶺，浮漢水而東，經今河南省鄧縣唐河，再向北逾秦嶺之東段。此可見成吉斯汗之詳審地形。開封陷落在太宗六年。

（三）攻杭州　其戰略更爲偉大，蒙古對征服江浙之事作爲第二步，先佔領我西南各省，其行軍路線由甘肅經西康直下雲南，繼則由廣西出兩湖，以破壞我後方之根據地，故南宋之亡雖欲苟延殘命而不可得。其自甘肅達雲南大理，時在憲宗三年。（宋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祖禹之言曰，「吾觀從古用兵，出沒恍惚，不可端倪者，無如蒙古忽必烈之滅大理也，自臨洮（在甘肅）經行山谷二千里，自金沙江濟，降摩狄，（今雲南麗江）入大理，分兵收鄯闡諸部，又入吐番，悉降其衆。夫從臨洮抵金沙江，亦不過二千里，行軍於無人之地，更不事假道於蜀中也。」其自廣西東下一段，祖禹之言曰，「蒙古兀良合台（速不台之子）從雲南入交趾，可謂艱遠之至矣，一旦破交趾而北，破橫山，進陷賓州，入靜江，（今桂林）遂踰嶺西破辰沅，戰於潭州（長沙）城下，與夫淮北之師相聲援也，繼又飽湖北，渡江而去。當是時，宋人戍之兵不下數十萬，而敵之出沒常若無人之境。然則善用兵者，交趾且可懸湖湘，涉江淮也。」蒙古入廣西在憲宗七年，（宋寶祐五年，一二五七）其後十年，於漢水上流治水師以攻襄陽，凡六年而後拔之，（元世祖至元五年至十年，宋度宗咸淳四年至九年，一二六八至一二七三）又六年而宋亡。

就上述三大戰役而比較之，北平至淶源其戰略軸線長一百五十公里，開封至鳳縣軸線長七百公里，杭州至大理軸線長達二千公

皇。趙翼綜論之曰，「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敵，故其武略比往古爲高。」（讀史方輿紀要總序二）

元代之開國規模實爲耶律楚材所手奠。楚材爲遼代宗室之裔，世書卿，生長燕京，（北平）父名履，嘗仕於金。成吉思汗南征，得楚材於中都，（即燕京）欽其博學多材，深爲依重，軍國大事悉以委之。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Urtu Saqal）蒙古語猶言長髯也。蒙古好殺，楚材嘗諫止之，多所全活。嘗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又謂「治弓尚須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太祖深以爲然，令其專理財賦，使國用充裕。其出征西域西夏等處，亦與之偕行。蒙古軍制之精備，耶律氏之功蓋不在成吉斯汗之下。太祖晚年屢告其子窩闊台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太宗即位後，嘗欲遣回鶻（即回紇）從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進言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乃止。太宗八年，（一二三六）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之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功也。」楚材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事元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官至中書令，卒於乃馬皇后稱制之三年，（宋理宗淳祐三年，一二四三）年五十五。卒時和林爲之罷市，葬於北平玉泉山之麓，從遺命也。楚材之名，本於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之義。有元立國規模，以蒙古之成法，參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而楚材實爲其關鍵人物。「經綸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於中流。」（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文）蒙古之吸收中國文化，由於漢化已深之耶律楚材，誠爲元代第一名相。

元世祖發兵二十萬大舉伐宋，命伯顏爲統帥，三年而滅之。伯顏蒙古巴鄰氏，深謀善斷，其行軍賞罰信，紀律彰，未嘗妄殺人。師入臨安，（杭州）市不易肆，有宋名將曹彬之風。奉詔班朝，口不言功。賦裝惟襆被而已。嘗奏言「江南川渠通利百貨皆以船運，比之車運載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疏濬河渠，令遠方貢獻京師，由此而達，誠爲世之利。」帝從之。其後海運之議，亦發自伯顏云。（新元史卷一五九伯顏傳）滅宋以後，伯顏迭遭親貴之譏陷，蓋其在蒙古中爲疏族。

成吉斯汗以來，定中原，取江南，亦賴漢人之力。如史天澤張弘範其著稱者。史天澤字潤甫，今河北永清人，出入將相，佐世祖於門。張弘範字仲疇，今河北定興人，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南伐宋，以弘範爲先驅。杭都既下，又執文天祥於嶺南，殲宋師於崖山，宋亡。天澤弘範之故里，皆久經淪陷之區域也。元世祖時，命中亞不花剌人（Bokhara）回教徒賽典赤贍思丁（Seyid Edjell）統治雲南。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來降，命值宿衛，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先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夷遠近爲圖以進。既至滇，教民播種，

為陂池以防旱潦，又立孔子廟，銳意興學，山民舊習漸除，西南諸夷翕然款服。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雲南建省始於元代，而賽典赤為功之首。

元代出師海外，惟爪哇之役最大。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命史弼（字君佐，今河北博野人）等發兵二萬，將舟千艘，齎糧一年，自泉州揭帆往征，歷交阯占城界，明年至其國，水陸進攻，爪哇降。歸途自爪哇至泉州，再行六十八日夜。惟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范文虎率師二十萬渡海攻日本，於八月間適遇颶風大作，戰艦皆破壞覆沒，士卒大半溺死，無功而歸。日本狡焉思逞，於斯肇焉。

（七）明代

明代兵源將才之地理分佈比之前代較為均勻不偏於一方。

明初有南北軍伍更調之制，黃河流域之人須赴南方補伍，南嶺區域之人，須往北邊補伍，後以其不便而罷去之，蓋北人南役苦於炎蒸，南人北征苦於嚴寒，水土不適，多致死亡。況北方邊塞，防守為急，以其地壯勇之人，遠戍南方，亦非計之得也。憲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六）以後，更調之制遂廢，軍伍分配各因地制宜。惟局部補充，取給異方者，仍所不免。戚繼光練浙兵防守燕山，即其著例。

有明之兵源，閩浙民兵與西南土兵，特可注意。嘉靖年間，倭寇肆虐，閩浙殘破，衛所兵不堪禦敵。一時名將如譚倫戚繼光輩，咸募當地民兵，親自訓練，極有成效。大抵金華紹興台州山地之兵，長於陸戰，福建漳州泉州福清沿海之兵，長於水戰，殲除倭寇，兼資水陸二軍之力。就中戚繼光一軍特精，兵士多義烏諸暨一帶人，號稱戚家軍。繼光嘗曰，「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惟浙兵能之。」倭寇既平，繼光移鎮薊東，鑒於邊民苦於敵騎踐躪，銳氣奪於積威，士氣難以復振。乃選募浙兵北上，與燕趙之士相兼訓練，使其知勇有方，立功甚著。

宋時有所謂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異族雜居，種落不一，其內屬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明代陝北隴東邊外土著善騎射，英宗命領練以備秋防，亦宋代蕃兵之遺風。明時所謂土兵者，多指西南苗族傜僮土司所領之兵而言，其最著者有二區。一為湘西永順保靖之土兵，皆係熟苗。一為桂省西北宜山南丹東蘭凌雲一帶之土兵，皆係僮人，又稱狼兵（狼人為僮人別支）。此類土兵皆勇悍善戰，明時常調用以取勝。惟所過剽掠為害，故識者謂不宜[illegible]調云。

成祖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廣西傜僮為亂，即兼用土兵，以平之。蓋傜僮倚恃岩險，出沒不時，兵至則散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村，官軍不能深知，惟土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故命土軍與官軍合勢攻擊，此乃用土兵平亂之始。其後若進討南贛倭寇，亦藉助於湘桂土兵。王守仁之平桂省亂事，亦嘗資之。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播州（貴州遵義）之亂，以其地山嵐溪澗，步騎不能馳騁，乃調廣西狼兵萬人，赴四川遠征，卒賴其力以收效。自是以後，有兵事往往依土兵

爲用，至崇禎年間，四川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慕公好義，爲土官中最諳戰力鬪事者。秦良玉四川忠縣人，嫁石砫（四川石砫縣）宣撫使馬千乘，夫婦皆嘗從征播州，戰功第一。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部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明季關外危急，義切勤王，皆督赴遼西，有戰功，以一女子而能親歷行陣，爲國禦侮，實爲中外歷史所罕見。

明史言，明初諸將以六王爲稱首，六王者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開平王常遇春，（字伯仁）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字鼎臣）黔寧王沐英，（字文英）遇與和皆濠人，（鳳陽）與太祖同里閈，遇春懷遠人，英定遠人，愈虹人，（泗縣）文忠盱眙人，太祖姊子也。秦以後，淮河流域多產將才，而明初爲尤盛。達與遇春嘗率步騎二十五萬人，恢復中原，盡驅敵人於塞外。遇春衝鋒陷陣，敢於深入，達尤長於謀略，二人齊名。而太祖謂諸將御軍持重有紀，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燕都既克，乃修治北方邊塞。今之長城，實中山王所築，榆關之改稱山海關，亦始於此時，故與首都城垣爲同時代之建築。

李文忠嘗以十萬人出野狐嶺，（在張家口之北）克興和（察省張北縣）開平。（元上都，今多倫）當時開平設衛，興和設所，與大寧（熱河平泉）合稱口北三鎮，鄧愈經營西北，招諭川甘邊境藏族諸酋長，於黃河上流洮河湟水二帶，築城置堡，移民屯墾，屯丁以鳳陽人爲多，婦女亦隨之而來，所謂鳳陽婆是也。（至今洮湟間一部女子服裝猶存明代遺風。）沐英經營西南，攻克大理後，留鎮滇南，屯田開鹽井，百務俱舉。明初江南人民，從征雲南者甚多，薰陶教化，日以雜新。湯和則經營東南，自明州（寧波）泛海取溫州，嘗於浙江沿海設衛所五十九處，以防倭寇。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沿海城戍皆堅緻，久且不圮，浙人賴以自保，多歌思之。

海上交通爲東西兩方之共業，當元世祖時，已屢遣使招諭海外諸國，爪哇一役已見前述。明初建都南京，清涼門外設寶船廠，所造大船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此即鄭和所乘，泛滄海數萬里，而遍歷三十餘國者也。鄭和雲南人，世稱爲三保太監，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和出使南洋與印度洋，通計官校勇士士民買辦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人，分乘寶船六十三號之多。和發非洲東海岸，在明宣德五年，（一四三〇）葡萄牙人達非洲最南端之好望角，在一四八八年，尚在鄭和之後五十八年。其後四年（一四九二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鄭和之七次航海，其功業之炳耀，殊不亞於哥倫布之四次航海。明之聲威既遠達南洋諸國，亦會閩廣商民能自殖勢力於海外。如明初有梁道明者，廣東南海縣人，久居三佛齊，（蘇門答剌島）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蓋生勢長，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直須現代，南洋儼然爲海外之中華民國。

南宋時代痛飲黃龍府（今吉林農安）之願望，直至明初始克實現。清代官撰諸書輒曰明初疆域東盡開平鐵嶺，實則松黑流域屬明初奴兒干都司地，此明成祖用水軍安撫奴兒干（即赫哲人爲隋唐時代黑水靺鞨之遺裔）之績效也。明代黑龍江水師之船廠即置於吉林，故至今吉林省城猶有船廠之名。明永樂九年遣太監亦失哈（似爲蒙古人）等率官軍二千人，巨船四十五艘，沿松花江出師，往奴兒干。自永樂九年至宣德九年計二十四年，（一四一一至一四三四）亦失哈奉使奴兒干凡四次，海外苦夷（即庫頁島）皆奉其約束，黑龍江之永寧寺碑今尚赫然存在。（碑在黑龍江口廟街對岸特林 Tyr 地方，今藏海參崴博物館。）讀其碑文，足以證實明代之兵力非祇一履其地，且曾更番戍守，然則黑龍江下游之地固未可斥之於明代疆域之外也。

越南自唐之亡，不屬中國者四百餘年，至明而復入版圖。成祖永樂五年（一四〇七）七年十一年，因越南內亂，命張輔率兵進討，撫定其地，計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遂設交阯布政司，直隸中央。輔字文弼，祥符人（河南開封）在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遞，規畫甚備。輔三定越南，威名聞海外。暹羅緬甸明代亦來歸貢。英宗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王驥征麓川至孟養，明麓川宣撫司在雲南騰衝西南，孟養則稱何密芝那，在今滇西邊外伊洛瓦底江西岸，土人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伊洛瓦底江亦名金沙江）今王師所至眞天威也。驥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大書深刻，凡過此者皆得見之。（清光緒二十三年英人毀碎沉之江中）王驥字尚德，河北束鹿人，曾官兵部尚書。至今滇邊江心坡各寨設有專祠，祀諸葛武侯及明王尚書，春秋二季奉行不衰，各山寨均守祖先遺言，世爲漢朝子孫，不敢忘背。王守仁曰「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誠有君子而爲焉，其化之也蓋易，一折首義然。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守仁十五歲寓北京，出遊居庸山海關，縱觀山川形勢，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生平留情武事，遍讀兵書，且善射。自貴州還朝後，平贛南積年山寇，及寧王宸濠之亂，封新建伯，又遠征廣西，平定土人之亂。陽明最大之貢獻，不僅在其戰功，而在其倡致良知之教，注重將帥之精神修養，建立中國之軍事哲學。良知非聞見小知，乃眞知也，有眞知而後有應變之能力。人事之最富於變化者莫如軍事，良知在我，皦如明鏡，方能以不變應萬變。雖紛紜交錯，而是非不昧，雖瞬息萬變，而清明在躬，故能獨來獨往，出奇制勝。所謂「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攻則攻敵之不能守，守則守敵之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在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也。」（顧祖禹語）有明一代文人用兵制勝，未有若守仁者。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故卒能擺大亂而弭大難。宋儒張載（

子千厚，鄞縣人）早年好談兵，其弟子亦多明習邊事，爲關中學派之特色。守仁於軍事缺當之中，講學不倦，其弟子如鄒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聶豹（字文蔚，永豐人）等，皆參與軍事，於邊塞兩陣攻守靡不精究。陽明之武功，往寄軍令於內政，寓將才於學府，而尤注重民德之改善。姚江學派誠爲吾民族朝氣蓬勃精神之遺產。

西南諸省雖早隸內土，然邊地民族稍類殊別，自相君長。秦漢以來雖設郡縣，仍令自保使羈縻不絕。至於元明，復於郡縣之外，分設土司，漸漬濡化，日就開發。下及清代，乃改土司爲流官，而民族同化作用，迄今猶在進行中也。明代廣西屢有亂事，憲宗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大藤峽（紅水河峽谷在桂平縣北，地最險）徭人猖獗，入梧州城，命韓雍（字永熙，江蘇吳縣人）討平之。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思恩（武鳴縣北之思恩舊治）田州（百色縣東）及八寨（上林縣北）等處僮人作亂，王守仁討平之。守仁集兩廣江西湖廣四省兵於南寧，力主以威德撫諭，雅量鎮物，叛衆七萬悉降。又於南寧創設敷文書院，聚靡僚諸生講學，其影響至爲深遠。

嘉靖年間平定倭寇爲一朝大事，譚綸戚繼光俞大猷任環諸氏功績最著。譚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沈毅知兵。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倭寇犯寧波，三十二年，倭入兩浙，轉掠蘇松，進窺南京，海內騷動。三十五年譚俞戚三氏會合浙江，同心禦侮，始有轉機。綸治兵寧波台州。募浙東良家子爲兵，躬自訓練。未幾即成精銳，率戰於象山舟山，倭患稍紓。倭在浙受創後，以福建爲巢穴，縱掠沿海州縣。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譚綸巡撫福建，與俞戚等大破倭賊，乃立水砦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時張居正當國，尤心於軍謀邊務，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以綸爲兵部尚書，主持廟算，尤注意於北防，常巡行塞上，指授方略，邊境晏如，綸始終兵事三十年，名位尚在戚氏上，世稱譚戚。

戚繼光字元敬，世襲山東登州衞（蓬萊縣）指揮僉事。繼光爲將精於訓練，臨時則颷發電舉，其所部浙江兵，尤長於山地戰，當時稱爲戚家軍。其練兵備倭，閱歷至深，因累其經驗所得，著紀效新書與練兵實紀，蓋脫胎於李靖兵法，於旗鼓步伐之法闡詳，繪圖立說，明白指揮，最爲切實可據。倭寇既平，繼光移兵鎮守薊東，嘗於塞上七闕二十萬衆，咸遵紀律，時人以李郭比之。有明一代知兵者莫不奉戚氏之書爲準繩。湘軍編制即根據於戚氏束伍練技之成法而變通行之。

俞大猷字元輔，其先安徽鳳邱人，明開國後，世官泉州衞百戶，遂籍福建晉江。與繼光協力防倭，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嘗夾擊敵軍於南澳（廣東南澳縣在汕頭東孤懸海中）大破之。大猷用兵務持重，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在兵間垢十年，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大猷嘗謂「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海潮，人力不可與抗，且我就所短而彼用所長，邀擊於海中未爲良策，故不如設備於海上。」又謂「海上設備

必當厚集其力於明州」。明自正德以後，海防漸弛，倭寇乘之，流毒上國，故大猷之論惟士防禦。楊溥（字弘濟湖北石首人）爲宣宗朝賢相，有言曰「際戰於海岸，不如邀擊於海外」。溥在內閣正爲鄭和航海之時，前後比觀，足以見明代海運之隆替矣。

任環字應乾，號復庵，山西長治人。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由越入吳，剽掠焚殺，勢張甚。環時服官蘇州，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敗賊於上海及太湖沿岸。在軍四年，大小一百一十戰，斬首級五萬，保二十餘城，屏蔽東南，使賊不得長驅而北，其所係至鉅。環善射，發必命中，賊捻識而畏之。其論禦倭謂如治病，當培元氣，元氣不培，而責效於金石草木之微，此得之，彼失之，暫瘳之，必復之，未見其爲完人也。識者以爲名言。

自倭亂起後，凡人痛心國難，發憤著書，論述國防者，一時稱盛。地形水勢古今略同，讀其書未嘗不足以資考證。胡宗憲字汝貞，安徽績溪人，嘉靖三十三年總督浙江軍事，主持禦侮大計，俞大猷輩皆受其節制。宗憲撰籌海圖編，於明代海防言之甚悉，唐順之鄭若曾茅坤皆在宗憲幕中。順之字應德，江蘇武進人，於學無所不窺，於地理兵法皆究極原委，撰武編一書，論用兵指要，唐宋以來名臣奏議，採撫甚富，亦多閱歷有得之言。若曾號開陽，江蘇崑山人，撰鄭開陽雜著，其論江防海防形勢皆所目擊，其日本諸考亦咨訪詳究，得其實據。茅坤字順甫，浙江吳興人，好談兵，胡宗憲爲督府，與之籌商，用其策爲多。其孫元儀字止生，著武備志五種，曰兵訣，戰略，陣練，軍資，占度，（軍事氣象以軍事地理）共二百四十卷，古今言戰略戰術之書，斯爲最詳。自序謂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成書，而患於疏略，或羅之以目，而患於猥雜。是書循時代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考索而得也。其言戰術，自制器練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險爲牧饋餉，歷代成法大端已具。是書成於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後元儀隨孫承宗經略遼西，（承宗守山海關凡四年，自天啓二年至五年）官副將，有所獻策，承宗信重之。

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薩爾滸之戰（在遼寧撫順中渾河與蘇子河合流處）滿洲努爾哈赤以八旗兵六萬破明將楊鎬四路二十萬衆，明清興亡肇於此役。于是遼陽瀋陽相繼淪陷，明人退守遼西。其後熊廷弼（字飛白，湖北武昌人）袁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人）皆以固守邊事，任兵部尚書先後經略關外，修飭邊備，轉危爲安。奈皆爲人排擠，俱以讒間誅死，不得竟其志。此後邊事益無人而明遂亡矣。南都草創之際，國事已不可爲。史可法（字憲之，河南開封人）以兵部尚書內閣輔策，外抗清兵。嘗謂「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必刻刻在復仇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奈奸臣竊位，其言終不能用，則效命疆場，死而後已。明之亡也，如何騰蛟（貴州黎平人）瞿式耜（江蘇常熟人）黃道周（福建漳浦人）張煌言（浙江鄞縣人）之流，皆崎嶇艱難之中，介然以興復自守，雖其

設施經營，未能一覩厥效，要亦時勢使然，其於鞠躬盡瘁之操，實無斷損，固未可爲訾議也。

（八）清代

滿洲爲女眞之族，即金之遺部。明初於其地置建州等三衛，服屬中國。努爾哈赤（即清太祖）之時，女眞部落分爲四部，曰建州部，曰長白山部，居於遼河鴨綠江間之山地，即明建州衛。曰扈倫部，即明海西衛，居於松花江流域。（松花江一名海西江）曰東海部，即明野人衛，居於黑龍江下游，際於日本海。開原撫順二地爲女眞諸部入貢互市必由之路。努爾哈赤以建州衛起兵，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日本侵朝鮮，曾請出兵征倭自效，雖未成行，但仍以保塞功，受封爲龍虎將軍。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聯合諸部，叛明獨立，建元天命，稱國號曰後金，定姓爲愛新覺羅，（譯即金姓）遠紹前緒，以收攬本族之人心，後四年，有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其國都自興京遷至遼陽，又遷至瀋陽。其子皇太極（即太宗）於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即帝位，改元崇德，改國號爲大清。於建州舊稱尚極力隱諱，又以後金一名，恐引起漢人之反感，亦廢而不用。先是清兵屢攻遼西皆爲明守將袁崇煥所敗，嗣後籠絡蒙古，收熱河爲己有，由塞北而攻中原，撼動京師，崇禎十六年，皇太極死，其弟多爾袞擁立皇子福臨（世祖）而親自輔政。至次年三月流寇破北京，吳三桂開關迎清矣。

努爾哈赤幼時以質子入侍大將軍李成梁，（明初自朝鮮內移家於遼東鐵嶺）濡染漢人文化。崇禎六年明將尙可喜（遼東人）等攜重砲歸附後金，由是成立漢軍。崇禎十五年，明將洪承疇降，太宗大喜，以爲欲得中原，須獲一引路者，此可見其用心。清代開國之初，八旗威力震懾一時，四十餘年遂亡中國。迨入關以後，滿人養尊處優，銳氣消沮，失其驍勇善戰之風。三藩之役，先用八旗，師久無功，乃專用綠營以事征討，綠營則純爲漢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綠營爲戰鬥之主力，而參用滿兵。（如黑龍江之索倫人，居西興安嶺，以騎射聞名，伊犂衛藏之軍事，索倫兵無役不從。）清代邊疆之開拓，外蒙青海準部回部金川（今西康）西藏等地之次第平定，武功之盛，邁於宋明，大抵皆漢人之力也。

綠營編制以省區爲單位，每省有一提督爲其總指揮。戰時調遣，例由各營抽湊而徵調萬人以上之隊伍，往往須湊集數省之兵，分子複雜，地方色彩甚爲淡薄。清代中葉以後，綠營制亦衰敝，嘉慶初年，川楚教匪之役，綠營勞而寡功，始賴鄉勇助戰。鄉勇一稱鄉團，又稱團練，本爲民衆自衛組織，故事平即撤，未嘗成爲經制之兵。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鴉片之戰，綠營不能對外作戰，終成金陵城下之盟。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國軍興，綠營更處處崩潰，不堪收拾。朝野上下復議辦團練，募鄉勇，咸豐同治間，各省多用勇營以資防剿，而湘軍以領導得人，翹然特出，爲勇營制之中心勢力。當時各省勇營人數在二十萬以上，其中湘軍約十二萬人。湘軍兵士皆湖南籍，湘鄉邵陽一帶尤多，將

領則湘人佔十分之八以上，湘人中湘鄉籍又佔十分之四。曾國藩所撰湘鄉昭忠祠記，至謂「一縣之人，征伐遍十八行省。」金陵克復後，湘軍即遣散，繼之而興者以淮軍爲中堅。其後左宗棠復募湘軍，平定陝甘回亂，遠征新疆，卓著戰功，湘軍係將領自招之募兵制度，地方色彩甚濃，所謂「兵必自招，將必親選，」淮軍繼承湘軍之系統，北洋軍隊又繼承淮軍之系統，極其流弊則「國權於將，將權於兵」造成民國以來武人割據之局面，茲不具述。

明代嘗用土兵以禦敵，清代仍之，鎮筸土兵尤著稱。鎮筸近湖南乾城，扼苗疆之要衝，與明之永順保靖區域相連。林則徐云「鎮筸地方在萬山之中，其人務力鬪強，術性情剽悍，用之以制敵，皆能奮勇爭先，緊之於平時，難免持強生事，駕馭之法本較別處營伍爲難。」（林文忠公政書湖廣奏稿卷二）咸豐元年曾國藩奏言「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筸，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其地位可以概見。甘回藏諸族，號稱強勁，嫻熟騎射，幾若性成，回軍組織較早，同治回亂左宗棠駐節甘肅涇川，河州（臨夏）回民馬占鰲率衆投誠，光緒回亂，其子安民亦助討有功，河州回軍乃漸成系統。藏兵明清以來，亦著功績，屢有賞賚，同光回亂，漢人多託庇於藏民。

鴉片戰役林則徐始倡募水勇，謂粵東漁人蜑戶以及濱海居民，多以採捕爲生，不畏風濤之險，誠能招募操練，係屬因地制宜。太平天國之亂，湘軍用水陸合圍之法，方能收功。清廷論湘軍平敵功，以水師爲首。湘軍水師一萬二千人，戰船八百艘。後湘軍雖解散，而水師則改爲經制水軍，且爲我國興辦海軍之嚆矢。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督閩時，創設造船廠及船政學校。十三年沈葆楨請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學習。福建人習新式海軍最早，清季海軍將領多閩人，以此也。

中國第三次開發西北在清康熙乾隆間，清初天山北路爲準噶爾部所據，準噶爾乃西蒙古之一族，以伊犂爲中心，勢力強大，東侵蒙古，南侵西藏，與中國抗衡。康熙帝親征準噶爾，敗之於外蒙古。至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兵掃蕩伊犂，準部悉平。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天山南路）清廷以將軍駐伊犂，並轄南北兩路。是役名將爲阿桂（字廣庭，滿洲正白旗人）回疆既定，後西征帕米爾高原，移駐伊犂與屯田以足軍食。

康熙時，準噶爾部曾侵擾西藏，肆行猖獗，康熙帝有云，「西藏之地，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噶爾盜據之，則邊境將無寧日。且準噶爾能衝越絕險而至，況我軍乎。」於是清軍大舉入藏，當拉藏汗當日之戰場，通天河（即金沙江之源）爲將軍大本營所在，由當拉嶺日進至拉薩，西藏平定。乾隆時廓爾喀（即尼泊爾）擾人邊境，掠扎什倫布，西藏大震。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大將軍福康安（字瑤林，滿洲鑲黃旗人）征討廓爾喀，分三路逾雪度山，破其國都，奏凱而還。福康安辦理西藏善後事宜，悉從之，此後西藏純然爲中國之領土。

大小金川（小金川即鴉龔江）分屬西康省，其地山高谷深，已

綜其功，故歷代學者論用兵（政教未加流化猶微）最重要之戰役，當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之平定金川，斯役亦以阿桂為首功。考乾隆朝平準回二部，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兩，金川用兵五六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兩，其攻取若此之難。清初貴州猶有苗亂，雍正初年鄂爾泰（字敬庵，鑲藍旗人）平定之。明代西南各省有流官土司之分，鄂爾泰建議改土歸流，加強統治，於開發西南，功績最鉅。清代軍機處權最重，鄂爾泰阿桂與福康安，皆以宿將入贊中樞，主持軍國大計。

清初滿人名將尚有額勒登保（字珠軒，正黃旗人）從征金川廓爾喀等處，歷立戰功，三省教匪之役，總司經略，統籌全局，秦隴楚蜀之交，巴山老林，素為流賊嘯聚之所，乾隆明末年川陝教匪即以巴山為巢穴，先後用兵九載，費帑銀二萬萬兩，至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始平定。額勒登保世為吉林珠戶，不識漢文，（曾讀滿文三國演義，略知古兵法）總府中有胡時顯（江蘇武進人）從贊軍務，得力甚多。此外以漢軍立戰功者，當推年羹堯（字亮工，漢軍鑲黃旗人）以漢人專征伐者有岳鍾琪（字東美，四川成都人）與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人）年羹堯在雍正初年平定青海，撫綏蒙藏諸族。岳鍾琪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平藏之役，首得拉薩，大破準噶爾擾藏之兵，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隨大將軍年羹堯經營青海，所向有功。施琅初隸鄭芝龍部下，成功據台灣，謀恢復，招琅不從。仕清官福建水師提督，善水戰，尤諳海中風候，謂台灣雖在外島，關四省利害，斷不可棄。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琅率水師渡海，取澎湖台灣，悉平。

中印半島越南麥國（暹羅）緬甸，清初皆我藩屬，世修職貢，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緬甸攻暹羅，破其國都阿由提亞（Ayut-hia）殺其王，暹羅遂亡。乾隆帝遣將軍傅恆（福康安之父）阿桂等征緬甸，緬人調征暹軍自救，暹京之陷也，中國人鄭昭與義師謀復國，構兵數年，決以緬甸困於中國，鄭昭乘其疲弊擊破之，失地盡復。昭泰語義為王，原名信，廣東澄海縣人（舊屬潮州），父鏞賈於暹羅，生信，長有才略，仕於暹羅，既破緬軍，國人推之為王，遷都盤谷，鎮撫綏輯，國以殷富。乾隆四十六年，鄭信遣例入貢，詔褒其有興廢繼絕之功，信卒無子，壻鄭華嗣立，乾隆五十一年遣使入貢，並請封，乃封華為暹羅國王。（泰國今王係鄭信第六世孫）時緬甸亦悔罪輸誠。泰國實為粵人所建之國，迄今已一百七十餘年，華人移民之盛如水之赴壑。泰國人口九百萬，中暹混血計其半數，純血統之華裔達二百五十萬人，國都曼谷半為華人，此皆鄭昭之遺烈也。

清代初期之中英貿易，鴉片為大宗，入口貽害無窮，若不爲拔本塞源之計，國脈民命均將葬送於無形。道光朝中國焚土之舉，實與美國人反抗英人稅茶之舉相類，乃美國得一華盛頓，一舉而勝，脫英獨立，我國有林則徐而不能竟其用，一戰而敗，遂為不平等條約之起源。林則徐字少穆，福建閩侯人，歷官兩江總督兩湖總督，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疏言鴉片之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

用之兵。道光帝深韙之，授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翌年蒞粵，鴉片必須清源，而戰釁亦不容輕啓。及戰事爆發，則徐力主堅持到底，當時中國海軍雖不克與敵決勝海上，但於沿海要隘嚴守藩籬，亦足爲持久之計。則徐負粵省海防全責，嚴兵備，以虎門爲珠江門戶，增修礮台以扼險要。英人在粵無隙可乘，乃北竄江浙。鴉片戰爭失敗之原因，由於中樞主持非人，和戰反覆無定。自則徐離粵，琦善繼任，力主和議，不修戰備，致英艦乘虛而入，攻陷虎門要塞，名將關天培死焉。關天培字滋圃，江蘇淮安人，時官廣東水師提督，則徐以其忠勇可用，倚之如左右手。天培以琦善不欲戰，無援故敗，海內傷之。道光二十二年，江甯和約成，則徐遣戍新疆，在伊犂辦墾殖水利，又周歷南疆八城，闢渠道，興屯田，勞績卓著。

同治中興湘軍將領曾國藩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皆湘人，李鴻章則皖人。太平天國軍興，湖南湘鄉知縣朱孫詒與諸生羅澤南劉蓉等，講求團練，爲保衞鄉邑計，初未嘗有意於戡定大難也。咸豐二年（一八五二）長沙之役，羅澤南率團丁千人往援。時曾國藩（字滌生，湘鄉人）以侍郎丁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國藩獨具卓識遠見，深知僅恃團練不足以禦强敵，乃上疏清廷，主張改弦更張，募團丁爲官勇，由是湘鄉團卒號曰湘勇。國藩取戚繼光遺法，募農民樸實壯健者朝夕訓練之，將領率用諸生，掃除陳迹，壁壘一新，此爲湘軍之所自始，時咸豐四年也。嗣後創立水師，屢立戰功，先後克復沿江重鎮，咸豐十一年受任爲江南總督，統率江浙皖贛四省軍務，至同治三年（一八五三）攻克金陵，亂事始平。

曾國藩未嘗以爲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謂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藉勉强磨練而出。湘軍之精神實受北宋關學之影響，重精思力踐，情意懇摯。國藩力倡樸誠勇敢之風，躬履諸艱，克己去僞，尤以官氣爲戒，其戰略曰「紮硬寨，打死仗」，重於防守，而終能屢蹶屢振，節節進攻。其治軍行政務求踏實，嘗曰「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用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又曰「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聖哲畫像記）其所持論如此。國藩雖在軍中，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網羅人才，提倡風氣，注意學術文化，而幕府賓僚之盛，冠絕一時。（薛福成有湘鄉幕府賓僚記。）

曾國藩有知人之鑑，胡林翼（字潤之，益陽人）在其部下，國藩奏稱林翼才勝於己，遂不次擢用，授湖北巡撫。林翼於武漢設重鎮，水陸東征之師皆恃爲根本，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克復安慶一役，由林翼先畫策，親自督戰，厥功甚偉。曾胡均以爲兵易募而將難求，一時頗有統領乏才之歎，但湘軍有一特色，其將領均有彼此相顧相援之美德，長短相補，成爲一優勢之軍隊。胡氏之協和諸將，苦心調護，尤爲曾氏所稱道。林翼嘗謂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選將，治天下之急病，莫如察吏，

兵事爲治標，吏事爲治本。又謂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將知兵，觀兵知將。林翼綜覈名實，幹濟冠時，倣唐劉晏用士人之法，訪察正士使之管理財政，又憂時賢不諳軍旅，因取左傳通鑑以下國史言兵事者，俾讀史兵略一書以教將才。曾國藩所作奏稿，每遇有關係之戰事，輒加評論，詞甚質樸，蓋深有得於左氏記事之法。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究心於輿地兵法，初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廣東花縣人）幕中贊助軍謀，曾國藩以其才可獨當一面，命督辦浙江軍務，規復浙省後，移師入閩。東南既定，而陝甘有回亂，師久無功，亦藉宗棠之力而後平。其作戰仍在步步爲營，立於不敗之地，其政略則但問良莠，不問漢回，以漢保回，以回保漢。此種政策果有明效，大顯示中華民族傳統之精神也。陝甘回亂，波及新疆，南路諸城先後失守，俄借伊犁，形勢岌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先是以東南海防吃緊，有議棄關外地者，宗棠力持不可。二年，親出關，北路平，三年南疆平，八年改新疆爲行省，實行移民政策。左宗棠於東南海防亦極注意，福建船政局爲其所手創。

由湘軍水師建議於江忠源（字岷樵，新寧人）蓋以東南形勢多用水，欲平亂，非治水師不可。咸豐四年，曾氏移駐衡陽，籌設船廠，練水兵，分爲十營。彭玉麟（字雪琴，衡陽人）雖爲當日營官之一，而隱主全軍，草創規制，多所贊畫，後遂受命專治水師。同治三年金陵克復，論功以創立水師爲首。湘軍崛起於綠營朽靡之時，以書生農夫奮起與洪楊角逐，而後滿洲之兵權乃完全操於漢人之手。湘軍非勤王主義，全由於自衛之必要而起，彭玉麟所謂予以寒士來，願以寒士歸，最足以表示此種精神。惜於政治軍事未能從事根本改造，後來之淮軍則江河日下矣。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初從曾國藩遊，講經世之學。同治元年以後，受命專任江蘇軍事，獨當一面。曾國藩謂淮上民風強勁，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山徑，馳騁平原非所長，故別練淮軍爲湘軍之繼。東南大定，裁湘軍，留淮軍。光緒年間鴻章以淮軍主帥獨當國事之衝，清代舊制，相權在軍機處，曾國藩與鴻章皆以總督兼大學士，遙領中樞。（略似唐末節度使領平章事者）聲勢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爲重。晚清國防外交大計，皆出於鴻章之手，思以新法導中國以求自強。曾李並稱，惜李氏得曾氏之用而無其體，故於晚清之世運，只能爲補苴罅漏之計，而不能有所轉移。甲午黃海戰役之失敗，中國非敗於物質而敗於精神。甲午中日之戰，關係我國國運至鉅，因日本佔朝鮮，致有日俄之戰，以俄國戰敗衰弱，乃啓德國席捲世界之心。又因俄佔旅順大連，復轉讓於日本，引起日本侵略東北之野心，爲九一八事變之導火線。

太平天國立國十有五年，版圖跨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使無湘軍之奮鬥，清之亡久矣。太平軍諸將皆嶺南人，洪秀全廣東花縣人，李秀成廣西藤縣人，石達開廣西桂平人。曾國藩克復金陵，太平黨與皆堅忍不屈，十餘萬衆無一降者，率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

今罕見之烈事。（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金陵克復悍賊盡數殲滅摺）容閎有曰，「此次革命雖經十五年劇烈之戰爭，乃不久而歸消煙散，於歷史上曾未留一足為紀念之盛蹟。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從夢中驚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觀於甲午以後，種種事實之發生，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見氏著西學東漸記）

國父之革命運動，發軔於中法越南之役，此次我國失敗，由於自餒其氣，陸軍作戰雖捷，而越南終非我有，罷戰令下，軍民解體，至今聞者猶有恨焉。斯役諸將如岑毓英（字彥卿，廣西西林人）馮子材（字翠亭，廣東欽縣人）劉永福（字淵亭，廣西上思人）皆粵人。毓英同治年間平滇西回亂有功，法越事起，以雲貴總督親赴前敵，節制關外粵楚各軍，克鎮南關，收復諒山，進抵河南，越人羣起響應，會和議成班師。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曾參與法越之役，後官台灣巡撫，甲午之役，景崧命劉永福守台南，自任守台北。割台議成，台民憤激，乃建民國，設議院，舉景崧為總統，事雖無成，亦民族自決之先聲。甲午黃海之戰，諸艦或沉或逃，惟致遠艦長鄧世昌（字正卿，廣東番禺人）以忠義激厲，與日艦同歸於盡，死事最烈。此種精神與黃花崗精神實為一脈相承。

清初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為吾國規模最大最有系統國防地理之名著。祖禹字景范，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四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三一至一六九二）其書乃竭二十年之心力而成之。自序述其父柔謙之遺命曰，「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又謂「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所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界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以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祖禹之著此書，用力之專精，成書之浩博，決非少年遺民消遣歲月之事，其孤憤宏識，深計遠慮，有在言語文字之外者。祖禹非僅欲以空言垂世，其救國之志願，未嘗一刻稍懈。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三藩起事，時祖禹年四十三，遂棄家南遊，居耿精忠幕中，復由贛省出嶺南泛海，冀有所藉手，圖覆清室，卒不得志而歸。在外凡三年，有詠史詩曰，「軍幃帳下未知名，降進軍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錯，如何壇上會談兵」此詩寄託遙深，以淮陰侯自況，可見其反清復明之壯志。讀方輿紀要不可不知祖禹之為人，亦惟知其人方能識其議論之用心。此書備載山川海岸險要，詳論南北軍事形勢，及古今用兵興亡成敗强弱得失之故。故方輿紀要一書實為中國古來言國防地理一大歸束也。

（民國以來之兵源與將才茲從略）

英印的經濟關係

鮑覺民

英印的經濟關係，始於十六世紀末葉至一六〇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獲得皇家特許經營東方貿易之大權，自是以迄十八世紀末葉之兩百年間，英國與東印度之貿易，幾全爲該公司所壟斷。當英國勢力之侵入印度以及早期英國與葡荷及法國在印之競爭，經濟的利益，遠過於領土的野心。葡萄牙人，雖爲歐力東漸之先鋒，但國力微弱，海軍力量，尤非英法之敵。荷蘭人之主要欲望，乃在香料羣島及爪哇，而於印度大陸，無力兼顧。惟法國野心勃勃，于一六六四年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對抗，英法兩國勢力之逐鹿於印度者，凡百餘年，迄一七五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書記克萊武率兵大敗法人於加爾各答附近之普拉西，英國獨霸印度之勢始成。

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初創設之目的，雖以經濟利益的誘引爲最要，但以時時需要對抗勁敵，抑制土人，距離本土既遠，交通又極困難，於是不得不具備軍事內政等功能，以一商業公司而同時行使軍政大權，儼然有政府規模，誠爲歷史上僅見之先例。其最可痛惜者，東印度公司時代之主要人物，多爲冒險之商人，既貪鄙私利，又少行政能力及遠大眼光，加之當時東西航路，必須繞道好望角，動輒經年始達，天高皇帝遠，公司內部之情形，自始即甚腐敗，除經營正常貿易外，對於印度人民橫徵暴斂，剝削榨取，無所不爲，至於其他非法的收益，如由土酋及土人方面公然接受的賄賂饋贈，爲數亦殊鉅大，甚至英明幹練如克萊武者，僅就由孟加拉土酋之賄贈一項收入言之，即達三十萬鎊之多，至今仍遺留英國初期統治印度史上的最大汚點。故其時英國和印度的經濟關係，直可謂爲予取予求，其經濟的利益，乃爲片面的而非互惠的，合理的收益以外，復加以非法的榨取。事聞於英倫政府，曾因此先後限制及剝奪公司一部份原有之權力；直至一八五八年土兵叛變一役勘定後，英倫始深感公司統治之失當，予以廢止，而代以正式派遣之大吏。二百五十餘年之英國東印度公司，至是遂永留歷史上之名詞。

自十八世紀末葉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原料品及食物之需求日亟，製造品之輸出，亦益增其在國家經濟上之重要。而印度則資源豐富，人口衆多，最適爲其工業原料及農產物供給之大泉源，及製造品與資本消納之大市場。加之自十九世紀初葉輪船發明後，航海之術大進，及一八六〇年，美國南北戰爭發生，棉花之來源驟減，不數年而蘇伊士運河開通，英印距離大爲縮短，有無相通，供求相應之需要，更爲自然的結果，而於「農業印度工業英國」政策之推行，尤爲積

極。

東印度公司，既經廢止，統治印度之主要人物，悉爲由英倫直接派遣之官吏，此輩雖爲維護英國在印利益之代表人，但究係具有行政經驗，且能體察政府治印政策之大旨者。此時英國在印之勁敵既除，土邦亦經收爲就範，英國爲更進一步開發印度的經濟，增加印度人民的生產能力，一面從事交通的開發，如鐵道之建築，電報電話線之敷設，以及海港之修築，既求印度各地間之有無互通，更求運輸費用之減低，尤以小麥棉花等農產物之出口，外國貨物之進口，較前便捷多多。一面又盡力發展水利，尤其在雨水較少，雨量不甚固定之印度河流域及恒河中上流之西北各地，疏濬河渠，開鑿深井及建築蓄水池，俾藉人工灌溉之助，使廣袤之荒地，變爲肥美之良田。

英國以其爲工業革命之先進國家，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國力強盛，資本過剩，故謀海外可以消納之場所，而印度自爲最適宜之目標。今日印度所有之公共事業，如鐵道航運道路碼頭銀行鑛業及灌溉制度等，其建造修築與經營，大部均爲英國之投資，其中尤以鐵道一項之投資額爲最鉅。印度之新式工業，仍極落後，其中較爲足稱者，當推棉紡織業，黃蔴工業，製糖工業，以及煤鐵工業，莫不爲英國鉅額之投資，甚至英國有一部份之工廠，爲就地利用原料之取給，市場之需要，以及低廉勞工之召僱，並且免除往返運輸之費用，而在印度各地設立分廠。至於農業方面規模較大之栽培事業，如茶園樹膠園及咖啡藍靛之種植業，亦大多爲英國人之投資。

凡此種種俱有積極性的建設事業，其受惠最多者，縱爲英國之資本家，及一部份印度之地主豪富，但對於整個印度國家經濟地位之提高，社會經濟狀況之改善，自有其極大之貢獻。是以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英印之經濟關係，可謂逐漸由片面的而進爲互惠的，並由非法的榨取，變更形式，訂爲法律，而成爲合法的收益。

三

英印之貿易關係，自一六〇〇年東印度公司成立，以迄十八世紀末葉之二百年間，印度貨物如絲織物及棉布藍靛等，源源西運，回程航船，則載以金銀，以相交換。及十九世紀初葉，英國之社會經濟狀況，因工業革命之結果，發生極大之變化。工業既代農業而爲國家經濟之基礎，英印間之貿易貨別，至是自亦隨之而有劇烈之變化。以前之英國，猶爲一農業國家，至是農業衰頹，工業大盛，農產物之產量大減，製造品之出產日增，於是工業原料和食物之供給，與市場之需要，蔚然成爲國家存亡之關鍵。以印度農產資源之豐饒，人口之衆多，一面既可供給英國以所需之原料和食物，一面又可消納其工業製造品。自是印度棉花，小麥，黃蔴，茶葉，皮革等貨物源源輸英，反之則英國棉織物及機器五金等之輸印，亦與日俱增。近數十年來，印度之新式工業，雖略有發展，但其出口總值中百分之七十五，仍爲工業原料和食物，尤以棉蔴茶麥四者爲最多；其進口貨值中百分之七十以上，則爲

工業製造物品顯示其為農業國家對外貿易之特徵。

至論英印貿易之數額及其消長之情形，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印度之對外貿易幾全為英國所獨占但自蘇伊士運河之開通，以及歐美各國乃至遠東之日本工業發展以後，印度有增無已之農產物原料之出口，已非英國一國所能消納，輸至其他各國之數量，亦與日俱增。迨至一九三五年印度出口總值中，其至英國本土者，不及三分之一，而輸至英帝國以外之其他國家，則達百分之五十四。至於英國貨物在印度入口貿易中地位之變化，尤值重視。當一八七〇年，印度之入口總值中，英貨佔百分之八十五，如連同英帝國其他屬地貨物之輸印，則合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自二十世紀開始後，印度之民族思潮，日益澎湃。尤以近二十年來甘地所領導之不合作及消極抵制英貨運動，發生極大之効力，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英貨在印度之市場，佔為日美諸國所劫奪，恢復不易，及一九三五年，英國貨物之輸至印度者，不及印度入口總值中百分之四十，即連同英帝國其他屬地，合計亦不及百分之五十，反之其自英帝國以外其他國家之貨物入口，則多至二分之一以上。英印貿易之總值，雖年有增加，但英國在印度出入口貿易總值中所佔之比例，則減退甚速。其消長情形，略見下表：

印度出口貿易之國別（百分比）及其總值

年度	英國	英帝國各屬地	其他國家	總值（百萬金鎊）
1870	54	20	26	53½
1890	33	23	44	69.0
1910	26	17	57	137.0
1935	31½	14½	54	120.0

印度入口貿易之國別（百分比）及其總值

年度	英國	英帝國各屬地	其他國家	總值（百萬金鎊）
1870	85	6	9	33½
1890	70	15	15	51.0
1910	61	8	31	86.0
1935	39	10	51	100.0

四

印度至今仍滯留為農業國家，全國三萬萬九千萬人口中，直接從事於農業生活者，約占百分之七十三；換言之，印度人口中，四分之三，均恃耕種田地為生。新式工業，仍極落後。印度之主要農產，有米，麥，棉，蔴，茶，糖數者，其中除稻米蔗糖二者多為自給外，棉蔴茶麥，均為出口之大宗。印度所產之棉花佔英帝國總產額三分之二以上；小麥產量，得全帝國總產額三分之一；茶葉產額，佔全帝國產額三分之二；而印度黃蔴之產量，達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幾完全壟斷世界黃蔴之市場。至印度棉花因品質較劣，纖維較短，不適於英國蘭開夏郡

棉紡織區之需要外，茶，蔗，小麥之出口均以英國為主要之對象。

除農產外，印度地下亦有豐富之蘊藏，尤以煤鐵二者為多。印度煤藏，約為六百萬萬噸，鐵藏亦達三十六萬萬噸，他如錳，鎂及雲母等鑛，均有大量之儲藏。又印度可能發展之水力總量，多至二千萬匹馬力，尤為可貴之天賦資源。所惜因工業落後，貨棄於地，尚未能充分利用。

印度雖具有廣大肥美的土地，富饒的經濟資源，但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極為低下，終歲辛勤勞作之所得，每難維持最低限度之簡單生活。衣食困難，營養不足，體弱多病，死亡率高，為最普遍之現象。衣食且不暇給，對於享受教育之機會與興趣，自然減少，以此不識字人數，估達總人口百分之九十。貧病愚三者，交相影響，互為因果。其顯著之結果，乃為生產效率之低下。如就印度之主要農產言之，印度每畝稻田，僅產稻十六公擔，而日本每畝稻田，則可產稻三十一公擔。又如印度每畝棉田，現僅產棉八十磅，而美國及埃及棉田每畝平均可產二百磅。其他各種農產物生產率大約類此。據前孟加拉省農業處長孟因博士稱，欲求印度土地之生產能力，增加百分之五十，殊非難事。

印度一般人民生活程度之提高，生產能力之增強，不僅需要農業本身之改進，而工業化之推行，尤為必要。印度工業發展之物質條件，如原料及勞工之供給，國內市場之廣大，均稱俱備。徒以自十八世紀末葉，英國工業革命後所持之「工業英國，農業印度」之治印根本政策，迄未能變，此不特為晚近印度有識份子所最引為痛心疾首，即英國一部分開明人士，亦每申論印度工業發展之應予倡導，良以英印經濟關係之維持與增強，必須建築于繁榮而和平的印度大衆人民之基礎上。且印度工業化之目標，原在自給，而非擴展海外市場，故不致有與英國工業製造品競爭於世界市場之危機。反之，則因印度大衆人口生產能力之加大，購買能力之增進，不僅對於一部份本國不能生產之物品，仍須仰給於海外之輸入，俾藉其所生產之剩餘，以交換其不足。且以印度人口之衆，如每人每年荷能多用一條手帕，多穿一雙襪子，即可使世界無數工廠增加繁榮。又如印度農田之稻棉產量，略有增加，則世界千百萬人之衣食問題，即可解決。印度經濟發展之結果，世界各國，倘可同沾利益，英國因歷史的及投資的關係，定可受惠最多。但欲達到長久友善的英印密切經濟關係，端賴于今日英國對於印度經濟發展，不僅予以誠意而合理的輔助，並能以積極而有建設性的方式，促其早日見諸實施。

土地與人生（講稿）

朴美驗

土壤與人生（書評）

任美鍔

Soils and Men 一九三八年度美國農業年鑑，華盛頓美國農業部出版。

美國農業部近來出版幾本年鑑，內容編制與普通年鑑很不相同，每本專門討論某一特殊問題，詳博精審，代表最近某一學科智識進步的總匯。一九三六年度美國農業年鑑所討論的題目是優生，一九三七年度是育種，一九三八年是土壤，一九三九年是營養，都是現代農學上的重要問題，而本書所討論的土壤問題，範圍最廣，內容牽涉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國家富強和人民生計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確是現代世界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本書由美國農業部一百多位專家合力撰述，從多方面的觀點，來研討土壤問題，根據浩博的實際材料和經驗，發為深入淺出的綜合論文，內容異常精審，誠為英文中討論土壤問題的最完備的文獻。本書包括論文五十九篇，共一千二百餘頁，分為五部，第一部為土壤與國家的關係，從經濟和社會的觀點，研討美國土壤濫用的狀況與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並提出救濟的方案和辦法。第二部為土壤與農民的關係，討論許多農作上的實際問題，如耕種方法，作物輪種，土壤肥料，土壤侵蝕等，根據最近農學智識，建議許多解決問題的新方法。第三部為土壤與植物的關係，研討各種植物所需要的土壤的種類，以及土壤成分與植物生長的關係。第四部為土壤學的要義，論述土壤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特質，對現代土壤學上許多重要原理，都有精要的介紹。第五部為美國的土壤，描寫美國全國土壤的情形，並附有彩色的全國土壤圖。

土地利用是現代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書所討論的問題雖多，要亦以土地利用為其中心。土壤是農業的基礎，也是世界文化之母，怎樣把土壤作最合理的利用，使其長期生產最多量的作物，以維持人類最高度的生活程度，這確是目前的主要問題。我們利用土壤，不能只圖一時的厚利，把天然富源濫加斲伐，使原來肥沃的土地，幾十年後變成磽瘠無用。我們利用土地要為萬世子孫着想，保持土地生產力，傳給後代，使社會的繁榮能夠繼續，民族的文化可以維繫，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所以要土地利用合理化，我們必須防止土壤的濫用。

要決定各處土地利用最合理的方式，我們必須兼顧自然環境和社會因素。人類生存和工作的環境兼為自然的與社會的。在某一時候，何種土地可以利用，應用何種耕作方法，可有何種成績，這些都要看社會和經濟的情形而定，亦視自然環境而定。故如社會與經濟的情形變化，必引起新的自然環境的問題，反之，一種新的農業技術

發明，亦必產生新的經濟問題。所以研究土壤與人生的關係，（即土地利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研究，須注意自然環境，自然方面的研究，也須顧到經濟情形。

現代的問題都是有機體，它們的解決不但須用科學的技術，並且還要採用社會或經濟的措置，雙管齊下，始克有濟，否則只執一端，常不能把問題完全解決。土地利用問題便是如此。土壤濫用的發生，一部份固然由於農民的昧於自然環境，但一部份也由農貸，租佃，地稅等制度的不良所促成，所以要補救和防止土壤的濫用，即防止土壤侵蝕，土肥喪失等，除採用合理的耕作和施肥方法外，還須改良現行社會制度和農業經濟制度的缺點，才能有效。整個土壤濫用問題的補救方案須賴自然科學者和社會科學者密切合作，共同草擬。這也可表示在研究實際問題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關係是怎樣密切。漢別奇若（Gove Hambidge）說得好，過去各專家研究某一問題，常只見一端，以致一孔之見，不能融會貫通，窺其全豹，以後必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者能打成一片，否則所謂現代文化，亦只是沙上樓閣，不切實際。現代文化的眞諦實在於綜合的整個，不在於片斷的零碎。

美國土地利用合理化的要點在防止土壤的濫用。土壤濫用所產生的惡果，最重要的是引起嚴重的土壤侵蝕。土壤侵蝕是國家不可補償的損失，土壤的肥力耗盡，結構變劣等，還可想方法補救，但如土壤本身被冲蝕消失，則在人生的短時期內，常無法補償，無法恢復，所以一地如表土全被蝕去，即將成為磽瘠不毛之地。據美國各地的實驗，在同一地點，如有兩塊田地，用同樣方法耕種，甲田表土全被蝕去，乙田表土未被侵蝕，則作物每畝收穫量後者約較前者高出一、五至七，十三倍。又假如甲田施用大量肥料，而乙田不施肥料，前者的收穫量還是要比較後者為少。所以在受劇烈土壤侵蝕的地域，農村大都凋零衰敝。如美國德克薩斯州的 Erath 區，區內耕田半數已受劇烈土壤侵蝕，表土全被蝕去，其結果，全區農家戶數一九一〇至一九三五年減少百分之二八，農村人口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三三，農業財產的價值，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五年，減低百分之五三。由此可見土壤侵蝕對農業影響的深巨，和防止土壤侵蝕的重要。

美國土壤侵蝕究竟已達何種程度呢？據一九三四年的調查，美國全國土地受微弱土壤侵蝕者（表土蝕去不足百分之二五）佔百分之三六、八，受中等土壤侵蝕者（表土蝕去百分之二五至七五）佔百分之四〇、八，受強烈土壤侵蝕者（表土蝕去百分之七五以上）佔百分之一一、八，土壤被蝕過烈，至今已完全不能耕種者佔百分之三。在已耕田地，土壤侵蝕進行更烈，一九三五年美國全國耕田共四萬一千四百萬畝，其中五千萬畝，因土壤侵蝕已全歸廢棄，不能再行耕作，五千萬畝，幾乎全廢，一萬萬畝受劇烈的土壤侵蝕，

目前之生產力只及原來的二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另有一萬萬畝目前也已受到土壤侵蝕的威脅。由上列數字，可見土壤侵蝕在美國確已成爲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土地濫用引起土壤侵蝕。土地濫用的發生，大部是由於社會的及經濟的原因，這些原因綜括言之，約有四種。（一）租佃制度：長期租佃爲維持土地肥力的必要條件，美國佃農約佔農民總數百分之四二，其租田期限普通只爲一年，所以他們耕種土地，也只知在一年以內盡力向土壤搾取，以生產獲利最豐的作物，至於土壤肥力因此會受到怎樣損失，表面土壤因此會受到怎樣冲蝕，都絲毫不加考慮。獲利最豐的作物如棉花，烟草，玉米等，都是損耗土壤的作物，假如年年繼續種植，不但損耗土壤的肥力，而且會引起嚴重的土壤侵蝕。但不良的租佃制度，迫使農民在同一田地上，年年種植損耗土壤的作物，不能對土地利用作長期的打算，採用輪種制度，把苜蓿等草類與棉花烟草等輪流種植，以保育土壤。（二）農貸制度：不良的農貸制度也能引起土地的濫用。目前美國的農貸抵押借款制雖可使耕者有其田，但因押款太大，農民爲償付利息，不能不將田地每年都種損耗土壤的作物。故結果也促成土肥的損失與土壤的侵蝕。（三）田稅：田稅與土地利用極有關係。美國現行的田稅太重，而且沒有延期付稅的辦法，這也使土地不能用以種植防止土壤侵蝕的作物，如苜蓿，牧草等，更不能用以造林，因爲草類和森林的每畝生產價值都不及損耗土壤的作物，而且土地種植草類和森林，常不能當年就得到收益。（四）物價的波動：近年來世界農產物的價格有過大的波動，穀賤傷農，中外皆然。物價的波動使農民每年的收入不穩定，不可靠，農民爲維持自己的生活起見，自然要年年盡量種植消耗土壤的作物，以得最高的利益，積些儲蓄，以防農產物跌價時，經濟陷於窘困。所以農產物價格的波動，也足以造成不合理的農田制度，而引起了土壤侵蝕。

我們怎樣能防止土壤濫用，減少土壤侵蝕呢？救濟的辦法可分爲農業的與經濟的兩項。農業的辦法，在利用現代農業化學，農藝技術，與農業工程，來改善目前的農作情形，但經濟制度的不良，既爲土壤濫用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除非我們能掃除這些根本的原因，則一切技術上的改良方法，必將無法普遍實行，而土壤侵蝕問題，還是不能完全解決。所以防止土壤濫用的治本辦法，尤在改善目前經濟制度的缺點，至於農作方法的改進，則僅爲一種技術上的手段。經濟的調整是解決土壤侵蝕問題的基本，如改良租佃制度，延長佃農租佃年限；改善農貸方法，在借款合同中規定土壤保育條件；修改現行稅制，凡種植防止土壤侵蝕的作物的土地，得緩繳田稅；增設國家倉庫，在物價下跌時，收購剩餘農產，以穩定農村收入，防止穀賤傷農。這些方案假如都付諸實施，必可使農民對土地不再加以濫用，即可根本的防止土壤侵蝕的發生。

現代農業是一種科學的技術，保育土壤尤其是一種高度的技術問題。要防止土壤侵蝕，我們不但須使農民不願對土壤加以濫用，而且還要使農民知道保育土壤的技術方法。保育土壤的技術方法，可分為植物的與工程的兩大類。從土壤保育的觀點看來，各種作物的性質，實大相懸殊，大概言之，棉花，煙草，玉米，小麥等種植稀疏，田地表面裸露面積很大，土壤侵蝕比較強烈，苜蓿等草類，把地面完全掩覆，所以草地的土壤侵蝕率很小，森林地也是如此，因為樹木下的落葉掩蓋地面，能保護土壤。據美國許多土壤保育試驗場的記錄，種植棉花玉米等作物的田地，土壤侵蝕率約較森林地大一千倍，較草地大二百倍。所以耕作應採用輪種制，以保育土壤，即耕田種植普通生長稀疏的作物二三年後，即應改種豆類或草類一年，這樣可以使耕田的土壤侵蝕不至太快。據美國密蘇里州農業試驗場十四年的記錄，在年年繼續種植玉米的田地，土壤侵蝕率每年平均為每畝一九、七噸，年年繼續種小麥的田地為一〇、一噸，玉米，小麥與金花菜輪種的田地為二、七噸，可見合理的輪種制能夠保育土壤。許多農民不願採用輪種制，因為田地在種植草類的一年，收益減少，不知適宜的輪種制，可以使作物每畝產量增加，從長期打算，對農家收入還是有利無害的。據密蘇里州農業試驗場三十年的記錄，如以玉米燕麥，小麥與金花菜四年輪種的田地，與年年繼續單種玉米或小麥的田地相比較，玉米與小麥的每畝收穫量，前者約較後者高出百分之八十至一百四十。所以適宜的輪種制度，既可保育土壤，又不減少農民收益，確是一種最好的防止土壤侵蝕的辦法。

普通雨水侵蝕土壤的速率，約與地面坡度的大小成正比，坡度愈大，侵蝕愈速。坡度較大的地方，僅採用輪種制，還不能防止土壤的被蝕。在這種地方，應實行條植法(Strip Cropping)，即耕田作物的行列，應略與等高線相平行，循着山坡分做若干條，其中幾條種植普通作物，幾條種植防止土壤侵蝕的草類作物，彼此交錯相間，這樣可以保育土壤。據美國德克薩斯州Temple地方土壤保育場的試驗，該處有兩塊坡地，坡度均為百分之三、五，一塊實行條植法，把田地分做六條，四條種棉花，兩條種草類，一塊循着等高線的方向，全種棉花，結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前者的土壤侵蝕率，僅為後者的百分之九弱。坡田的耕種應注意作物行列與等高線相平行，即與坡度方向略成直角，這樣可以減少土壤侵蝕，反之，如作物行列與坡度方向相平行，即循着坡斜，上下縱列，則土壤侵蝕率必特大增。據Temple土壤保育場的記錄，後者的土壤侵蝕率約為前者的二、三倍。中國邱陵地帶許多坡田，作物行列常與山嶺坡斜相平行，以致引起嚴重的土壤侵蝕，這是應該校正的。

假如一地的土壤侵蝕已達嚴重的程度，要防止土壤的繼續被侵蝕，則除上述植物的方法以外，還須採用若干工程的措施，如建築梯田，開掘排水溝渠等，才能有效。譬如一地受流水冲刷，深刻的溝壑

已切入地面，並在不斷的向上伸長，破壞良田，要穩定這溝壑，使它不再向上侵蝕，則最初必須採用工程方法，以濟其急，如另闢排水道，使地面之水不復流入此溝等。不過工程的方法是治標的，要防止嚴重的土壤侵蝕，使其不再發生，我們必須在地面種植茂密的植物，才能一勞永逸，植物是保護土壤的最好和最永久的工具。

此外，農田的適宜施肥，也可以減輕土壤侵蝕。假如土地耕種以後，不加以適當的肥料，土壤中的有機質即大為減少，有機質使土粒集合，造成良好的土壤結構，有機質一旦耗盡，原來良好的土壤結構即被破壞，而土壤因此遂易受侵蝕。所以適宜的施肥，也是保存土壤，防止土壤侵蝕的一種間接方法。

目前美國的土壤侵蝕問題，以在半乾燥區域最為嚴重。美國中西部，西經九十八度以西，落磯山脈以東，是一塊波狀起伏的平野，在地理上叫做大平原區（Great plains）全區雨量在二十吋左右，屬半乾燥氣候，所有的雨水恰好足夠作物的生長，是農業上的邊緣地帶。本區因受第一次歐戰時農產物價格高漲的影響，以及戰後農業機器推廣的幫助，耕田面積大為擴充。從經濟的觀點看來，這種半乾燥區域農墾的大量發展，是否對國家和人民有永久利益，實在還值得鄭重考慮。在大平原區，雨量的變率很大，每年雨水的多寡很不一定，譬如凱薩斯州（Kansas）的Hays地方，據六十七年的雨量記錄，雨量最多的年份達三五、四吋，最少的年份只有一二、八吋。大平原區已在農業帶的邊緣，作物對雨水的需要，有一個最低的限度，設某地小麥的雨量限線為十五吋，則如雨量某年不足十五吋，小麥即無收成。所以在半乾燥氣候的大平原區，雨量的變化對農業尤有決定的影響。多雨的年份，作物豐收，耕田面積擴充，牲畜數目加多，農業人口增加，地價高漲，地方經濟一切都顯得十分繁榮。但至雨少的年份，作物歉收，牧草枯萎，牲畜必須匆匆售脫，農民收入銳減，無以為生，成為破產待賑的災黎。大平原區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六年雨量豐沛，故地方經濟極為繁榮，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八年，雨量稀少，農村破產，災情立見，一九三五年度，許多地方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三的農民，完全須依賴政府的賑濟。一九三六年，華盛頓，依大阿，和奧里岡，三州旱災區域人民逃亡者達八千六百戶，（按此三州小麥區域氣候略與大平原相似。）像這樣的農村的不穩定，顯非國家和社會之福。除經濟上的惡果以外，半乾燥區域耕田的無限制推廣，破壞了原來的牧場，乾旱之年，耕田失去牧草的覆蓋，土壤受風力吹蝕，損失常極可觀，近年來，大平原區許多地方，三吋至四吋厚的表土已被風吹去，極大的風沙有時會把大平原的土壤直吹到美國大西洋岸，而若干地方，較粗的砂土，且堆積成為十五吋至廿吋高的沙丘。所以大平原區過度墾殖的結果，引起嚴重的土壤侵蝕，使若干地方完全變成荒地，永遠喪失了生產能力，以後想要恢復為原來牧場，也常不可能。

在耕種區域以西，美國西部是一個廣大的畜牧帶，每年雨量平

均只有十五吋，或在十五吋以下，而且變化很大，十年之間至少有三年雨量要較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在乾旱的年份，牧草生長便不甚良好。美國農民常在這種牧地上，豢養了數目過多的牲畜，結果較好的牧草全被食盡，地上草類跟着稀疏，每年腐爛的植物不足以補充土壤中腐殖質的損失，這樣，土壤結構逐漸變劣，易受雨水冲蝕。而且，因爲牧草減薄，表土受牲畜踐踏，更加速了土壤侵蝕。所以過度的放牧，使牧場的牧草變劣，土壤侵蝕加烈，容養牲口的能力減低，數目過多的牲畜，在生產力已經減低的牧地上放牧，結果自然把牧場情形弄得格外惡劣。美國西部的牧地，因爲過度放牧，其容養牲口的能力，已經較原來減少百分之五二，牧民生計大受影響。除了直接的惡果以外，牧草的殘害引起嚴重的土壤侵蝕，雨水從牧地上冲蝕大量泥沙，注入西部諸河，使它們在灌溉，發電，航行等用途上的價值大爲低落。近年來美國水災的嚴重與西部的過度墾種和過度放牧，實不無關係。

美國西部的慘痛經驗，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即半乾燥區域的牧地利用，必須用遠大眼光，作長期打算，墾殖和畜牧應在長久永存的目標之下，作種種必要的計畫，如牧地的牲畜數目不應達最高限度，開墾種植須把田地一部留作牧場，以畜牧爲耕種的副業，凡此都所以預防旱年，並減少土壤侵蝕和地力殘耗。只有作這種長期的打算，半乾燥區域的農耕和畜牧才能永久維持，農村的基礎才能穩固安定，不至於在雨少的年份完全破產，而半乾燥區域對國家社會，才能成爲永久的利藪。

中國內蒙古和陝甘北部，氣候環境略與美國大平原相同，其土地利用恐怕也須以牧畜爲主，農耕爲副，過去陝甘黃土高原的過度墾種，產生嚴重的土壤侵蝕，黃河水災的嚴重，與此實不無關係。所以就地方和國家的利益看來，作者曾提出西北土地利用將來應注重於發展畜牧事業（見西北之地理環境與經濟建設，重慶大公報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近日重讀美國農業年鑑，又值建設西北的呼聲響遍全國之時，特再鄭重提出這個建議，以供當局採擇。

土壤是人生的基礎，立國的骨幹，中國地大物博，全世界只有美國和蘇聯可以相與比擬，中國的經濟組織將來自也應與美蘇一般，農業與工業並重，以作平衡的發展，我們應該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這是全部經濟建設的大原則大綱領。如何利用土地，以獲得最大的收益，同時又不至殘耗地力，加速土壤侵蝕，這是我們國家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值得審愼的考慮，和精密的硏究。因此作者特介紹本書，以供他山之錯，同時並提出土壤侵蝕問題，以喚起國人的注意，本書所說雖大部限於美國的情形，但許多原則和經驗很可供我們的參攷。原書一千二百餘頁，短短的書評，自然只能舉其大概，關於土壤侵蝕問題的詳細情形，以及其他許多問題，如灌漑農業，土壤施肥等，欲知其詳，請讀原書。

學術通訊

儒家與墨法

熊十力

大刊十二期學術通訊欄內，載何鑑咏霓先生論墨家與法家，頗觸緊懷。魏晉以後，中國學術思想幾被印度佛家排斥殆盡。有宋諸儒，起而恢復儒家思想。於是中國人始認識自己。自典午之禍，北中國全淪於胡虜。唐太宗起而振之，未幾而天寶之亂，浸淫致藩鎮之局。藩帥又多胡人。自是迄五代，與夫遼金夏之割據，中國之危亡也久矣。宋儒於衰亂之餘。提倡孔孟。躬行力踐。拔人於禽獸之中。（試閱南北史，及五代史，當時吾民族悉染胡風。人皆懷禽心矣，欲別為文論之，而無暇也。）使民族精神團聚。外有強夷，內無叛變。（間有小寇賊，然一起即滅，無能為大患者，以羣衆所不與故。）其功不可謂不大。論者輒咎宋儒無救於國之弱。不知自典午以迄於五季，中國無生人之氣也久矣。若夫元人崛起，如大颶風，掃蕩歐亞，無敢當者。此殆有氣運。難為解釋。而謂諸儒不能挽救中夏之危弱。何責之苛乎。然宋儒亦有二失。一曰，只定孔孟為一尊，而排斥諸子過甚。則思想不宏放，即力量終欠活躍也。二曰，宋儒只言復仇。復仇者，復趙氏之仇耳，何足鼓舞羣情。若能如鄭所南，王船山，呂晚村，顧亭林諸先生，盛倡民族思想。則兩宋局面，或當不致如彼也。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之大，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又諸子百家所自出。本為中華民族的中心思想，今宜發揚光大。但不可如宋儒之拘礙。道墨名法，兼容並包，去短採長。細故亦所不拒，吸取其優。思想不限於一途，而未嘗無中心。譬如五官百體，各各發展無礙，而腦為中樞。若僅護頭目，而不顧[illegible]，未有能生存者。吾嘉宋儒之功，而病其礙。永懷當今，遠存殷鑑。咏霓先生所舉墨法二家優點，吾均贊同。然墨子邏輯謹嚴，則大易正名定辭之學也。其精製器，即大易制器尚象之道也。兼愛兼利，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兼利之旨，又即大學以理財歸之平天下，與夫絜矩之道也。人類欲免於自毀，舍此道無由。墨子言大同，春秋太平義也。其抗禦侵略，則春秋誅亂賊，及齊梁亡之旨也。（齊梁之自亡，罪其不能自存也。）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與殺身成仁不異也。墨之通於儒者，豈一端哉，此略言之耳。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則已兼採法家思想。然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則儒家主張畢竟有不可顛撲者。商君以法治致秦於富強。唯其立法之初，躬自行之，是以其法有效。武侯尚法治也，而本之開誠心，布公道。故能以法治而開蜀漢之基。以儒術融法家而綜治者，吾於武侯無間然矣。

（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致張其昀書）

談生滅

兩函均到，前一函云治新學者多迷信西說，以辨理之分析為能

事。……結果分析雖精，而了無生氣，此非卓識不能道也。然老鈍所感，時人於辭理分析工夫恐不無稍欠耳。學問之事畛域分明，而後得以專精，以邏輯還邏輯，而勿輕逐邏輯上之概念以結構哲學，或較妥當耶。邏輯無論有若何派別，要之不外為慎思明辨之術而已，是故哲學之所必資。然哲學者之所自得，畢竟由脫然超悟神妙萬物根本，不由思辨之術，但如僅止乎此，則恐務本而遺末，弊不勝言。（中哲之失在此）故透悟矣，而猶必精研事物，窮散著以觀會通，始證實其所超悟者，夫而後為本末賅備之學。求其精研事物，則慎思明辨之術不可以不精也。惟其有超悟立於先，則思辨不至流於紛碎與浮亂，辨之明思之慎，則超悟益引發而無窮，至此則事事物物皆真也，一切知識皆智也，哲學所以為活潑有用者在此。承示生不容住，則生與滅等不可言，生已可言生，則凡當有住，如電光之一閃一閃，就此一閃言，必有前后可分，必有住之可言，否則此一閃即不能實現也云云。此一問題極緊要，尊就何處說耳。新論尊意是就本體流行上言，[illegible]其生而不住，則不容住者乃實際理地也。若其有住，則是依本體而產生別一物事，仍與本體對立矣。電之一閃，纔閃便滅，何曾留住得剎那頃耶，其一閃閃，自是電之實現，然就彼一閃的本身言，本無有物事留住，雖忽然似有而確爾空無，既亦有亦空，則時間觀念於此本無安頓處。其以一閃一閃分前後者，乃吾人結習所為也。生滅之理唯閃電一喻最切，先生似疑纔生便有住，實則造化微妙，生而無生，無生而生，竟是生不容住，此未可以見緣物之習心去推測也。然雖說生不容住，並無礙於吾人所見有住萬物，自俗諦言不妨依生滅滅生相續流，故假說有物，纔說有物即易得住也。此意在上中兩卷亦時說及，下卷成物章更加推闡，談理到窮極處總不可滯向一偏，只此是矛盾而又[illegible]分明是兩者，大通分明是可說而又分明是不可說，住與不住，兩可言而兩不可言，默識焉可也。

又及者昔書中所說生生化化，意思是就本體流行上說，易言之即超脫物的觀念而言，如以生物發展的觀念而推衡吾所謂生化之義，自不能相應，望更詳之。（三十二年六月十日致謝幼偉書）

答謝幼偉論玄學方法

熊十力

十月十三日[illegible]函收到，[illegible]，第一，謂吾生平非孤恃性智而無事於量智者，此則誠然。第二謂玄學純恃性智，此純恃二字危險。[illegible]云云，先生用[illegible]少說一段話，也是有由此處耳。吾前信云見體以後必依性智而起量智，即昔儒所謂不廢格物窮理之功是也。此但為耽虛溺寂者防其流弊，如陽明後學盛談本體，而於綜事辨物之知，則忽焉而不求，此可戒也。夫量智者，緣物而起也。一切物皆本體之流行也，於流行成萬象而推度焉，本（本謂體）終止於推度之域，非本體呈露也。夫見體云者，即本體呈露時，自明自見而已，非以此見彼也。量智推度時，則以本體為所度之境，如度外在

的物事然。故量智起時，本體不得呈露，而何有見體可言。前信云純恃性智者，意正在此。此中義蘊，淵微至極。孔子所云默識，從來注家均是膚解。雖朱子亦未得臻斯詣也。(寂默者，本體也。識者，即此本體之昭然自識也。)若於佛經有深澈了解，又必自己有一番靜功，方可於此理有悟。不然，談見體，總不能無誤會也。西哲畢竟不離知解窠臼，吾故不許其見體也。難言哉斯義也。但見體雖純恃性智，而量智亦非可屏而不用。萬物既皆本體之流行，則即物窮理之功，又惡可已哉。所患者，逐物而亡其本耳。有智者悟量智之効用有限，而反諸性智，以立大本。則智周萬物，而不爲逐物，一皆性眞流行。豈謂量智可屏棄哉。學問須本末兼賅。求本而遺末，不免蹈空之病。非吾所謂學也。自量論言之，(量論一詞，見新論上卷緒言中。)見體之見，佛家謂之眞現量，(言眞者，簡別五識等現量。)亦云證量。於經驗界或現象界求其理則，依據實測，而爲種種推度，證驗畢具而後許爲極成。佛家說之爲比量。證量屬性智。比量屬量智。二者不可偏廢。此中千言萬語說不盡，有機緣，得與先生面論。第三點，西哲見體與否，不妨且置。此等問題，非憑知見可以判決。須放下知見，別有一番工夫，才可辨其得失。

(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答熊先生論玄學方法

謝幼偉

(上略)關於先生兩長函意見，(按即論玄學方法一文，見本刊十六期)大體贊同，然有數點不能不言者：

第一，幼偉絕不懷疑先生看輕量智，因新論(即新唯識論)一書，非於量智功力甚深者，決不能寫。蓋見體雖恃性智，然見體後之言說，則恃量智。見體後，若默無所言，或言而無當，則其見體與否，極爲可疑。先生於本體有所見，固所深信，然若無新論一書，則亦無法取信於人。即古今聖哲，吾人今日之謂其見體者，亦純從其言說上判定。然一涉言說，即入量智範圍。是謂玄學純恃性智者，恐非事實。口上縱如此說，實際其所恃者，決不能缺少量智。如先生之學，非生平曾於量智用力，恐亦不能到此境界。前評所謂玄學恃性智，亦恃量智者，宜謂此也。

第二，先生謂玄學純恃性智。此「純恃」二字，危險極大。因空疏不學者流，可以此爲藉口，束書不觀，遊談無據，而自謂見體，自稱談玄。設有一人，突立於先生之前，自謂見體，先生將許之乎？抑將據其言說之不合理，而駁斥之歟？憶朱子語類有云：「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見體如不以量智出之，即不能與之論是非，故玄學之事，一得之愚，認爲當以性智見體，而以量智明體，不能說純恃性智。先生已不遮撥量智，即當如此說，方可無病，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第三，西哲見體與否，其學問方法是否純恃量智，似均不能遽定立論。幼偉不敢謂其已見體，亦不敢謂其必不見體。如從其言說上論，則西哲之說，實有此土哲人之說相同者。如許此土哲人爲見體，則亦不能不許西哲爲見體。必一口咬定西哲爲不見體，恐仍不免武斷之嫌也。(下略)